报告 1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6-2007 年

China's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 Policies：2006-2007

2006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态势，向加强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稳步发展。2007 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采取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取向，通过稳健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积极操作，在最高可持续经济增长率（HSGR）的政策原则指导下建立价格、工资与汇率动态调整的一致政策目标体系，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一、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率的历时途径，如图 1 所示。中国经济在经历 1991-2001 年间的完整波谷—波谷经济周期后，从 2002 年起重新进入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呈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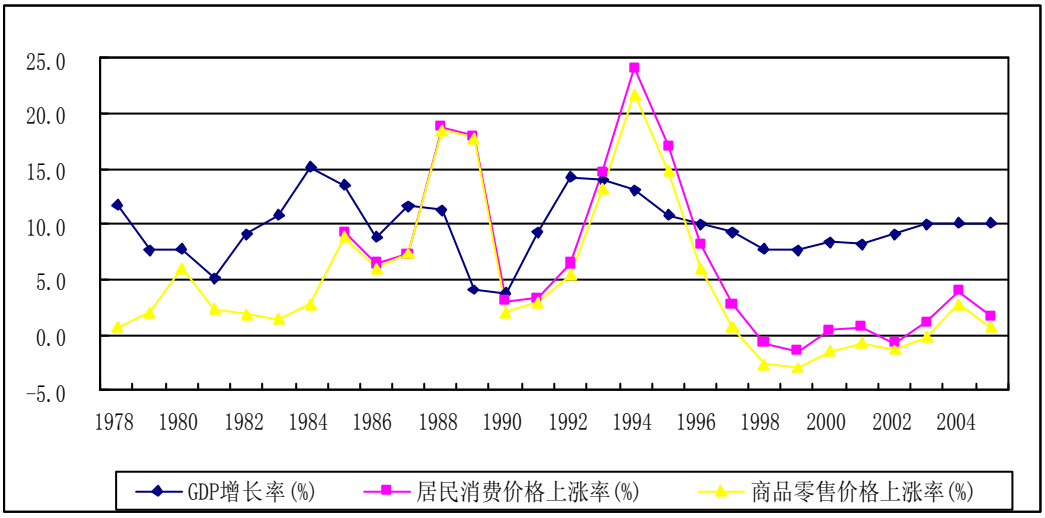


图 1　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率历时途径

2003 年与 2004 年实际 GDP 增长速度接近潜在 GDP 增长速度，而 2005 年实际 GDP 增长速度超过潜在 GDP 增长速度，其间通货膨胀却相对温和。中国经济景气在 2004 年

完成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实际 GDP 水平在 2004 年达到潜在 GDP 水平的基础上，在 2005 年已经略高于潜在 GDP 水平。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 模型，分年度预测 2006 年与 2007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势，其主要预测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2007 年预测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1）2007 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为 2900 亿元；（2）2007 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兑换率为 7.45:1。

表 1　2006 年与 2007 年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预测指标	2006年	2007年
1、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10.48	9.25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1	4.3
第二产业增加值	12.9	11.0
第三产业增加值	9.3	8.6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112530	1384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76310	86160
3、出口（亿美元）	9690	11730
进口（亿美元）	8150	9980
4、狭义货币供应（M1）增长率（%）	14.9	14.2
广义货币供应（M2）增长率（%）	17.2	16.4
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	1.5	1.9
GDP平减指数上涨率（%）	3.2	3.6

预测日期：2006 年 11 月

中国经济在 2006 年继承 2005 年的强劲扩张趋势，实际 GDP 增长率在 2006 年上半年逐季加速。不过，随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逐步实行，其选择性的需求紧缩政策效应已经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以及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景气从 2006 年下半年起开始转折下行，实际 GDP 增长速度相应向潜在 GDP 速度回归。2006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将继续保持

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将 CPI 指数上涨率控制在 2%以下的同时实现 10%以上的实际 GDP 增长速度。在增长型经济周期的位势上，2006 年将构成本次经济周期的波峰年度。

2007 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采取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取向，兼顾经济稳定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目标，进一步促进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以及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在总体经济景气进入本次经济周期收缩阶段后延续其繁荣状态。这样，在2006 年实际 GDP 水平高于潜在 GDP 水平的基础上，2007 年实际 GDP 增长速度将略低于潜在 GDP 增长速度，使得 2007 年实际 GDP 水平平稳回复至潜在 GDP 水平。

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1．经济波动的周期形态

依据中国实际 GDP 时间序列 Y，使用 OLS 方法拟合有容纳经济波动滞后效应的国民收入自回归方程，进而使用所拟合自回归方程静态预测而建立潜在 GDP 时间序列 Y_F，由此取得 1983-2005 年间实际 GDP 水平与潜在 GDP 水平的相对比率 Y/Y_F，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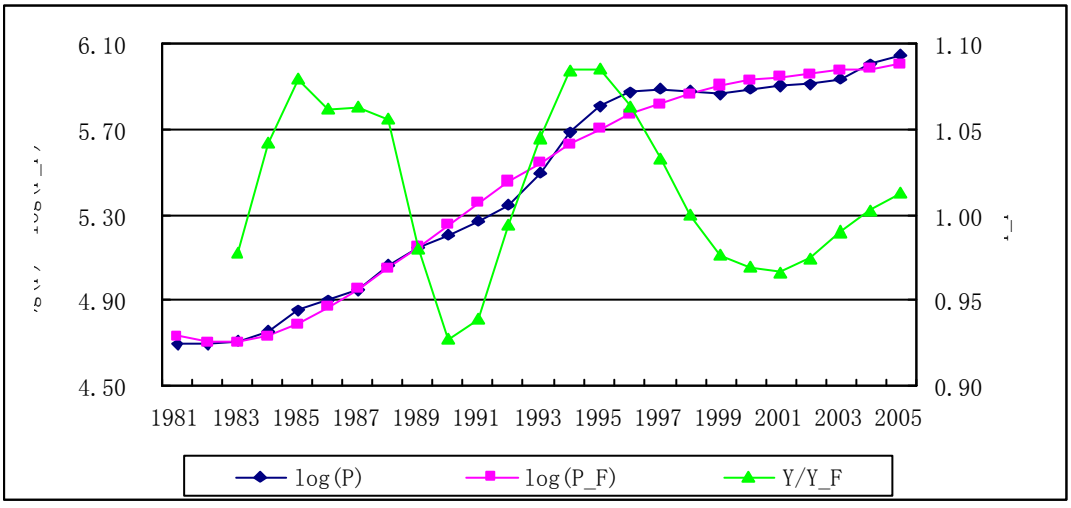


图 2　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波动形态

在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2002 年至 2004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具有恢复增长和补偿增长性质。虽然从 2003 年起实际 GDP 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潜在 GDP 增长速度，但是实

际 GDP 水平至 2004 年才接近潜在 GDP 水平，国民收入相对比率 Y/Y_F 在 2005 年与 2006 年也不可能过度偏离以基准线 Y/Y_F = 1。2001 年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形态如表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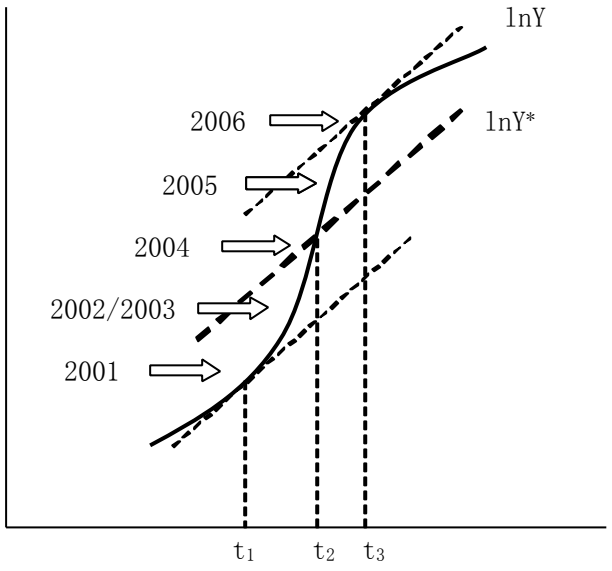


图 3　经济扩张过程与经济周期相位

对于中国经济体系，二元经济结构提供近似无穷的剩余劳动力，年轻化人口结构与高成长经济前景蕴含高居民储蓄倾向，先进技术跨国转移和吸收在经济全球时代更加便利。同时，重化工化、城市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开辟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空间，能够充分吸纳持续扩展的潜在供给能力。按经济增长因素核算，2006-2010 年间中国潜在 GDP 年均增长速度接近或略高于 9%。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三重协同转型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奠定生产率持续快速进步的资源、技术和制度基础，中国经济发展因而具有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历史趋势。

2．核心通货膨胀的历史趋势

表 2 概括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率演化的历史阶段，并且尝试给出相应的经验解释。若无国外需求负面冲击以及因错误判断潜在国民收入趋势而实行的相对紧缩货币政策，1998 年以来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率有可能在渐进消解以前高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完成其历史趋势向低通货膨胀阶段的平滑过渡，而不需要经历通货紧缩这样的过度调整过程。

表 2　核心通货膨胀率跨时演化

	阶段Ⅰ： 1980 年代	**阶段Ⅱ：** 1990 年代初中期	**阶段Ⅲ：** 1990 年代后期以来
1、历史特征	高通货膨胀	高通货膨胀	低通货膨胀
2、作用机制：			
驱动力量	价格自由化	工资完全化	国际国内市场竞争
表现形式	隐蔽通货膨胀公开化	实物工资货币化	生产率进步
3、制度基础	产品市场改革	劳动力市场改革	市场经济框架形成

从 1990 年代后期起，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率呈现低通货膨胀的历史趋势。如图 1 所示，1983-2005 年间中国 GDP 平减指数时间序列 log（P）类似有时间趋势的逻辑斯蒂转型过程（logistic transformation），其跨时演化机制能够以时间变量的四次线性曲线 log（P_F）模拟。

由于日益重型化的产业结构、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日益完善的国有产权制度，中国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是难以避免的。不过，伴随着有效市场竞争的生产率进步，沿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的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影响。PPI 指数与 CPI 指数在本次经济周期扩张阶段的通货膨胀率差异，不仅仅体现各价格指数的周期性质差异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成本推动的传递时滞，而主要反映生产率进步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成本推动因素的逐级消化作用。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支持下，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有效竞争促进生产率的持续快速进步，中国通货膨胀率因而将长期呈现从 PPI 指数到 GDP 平减指数到 CPI 指数依次递减的动态价格结构，并且保持温和的最终消费品通货膨胀率。

就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低水平并且相对缓和的通货膨胀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广泛经验研究肯定其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关系，全面揭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促进效率和稳定价格方面的重要作用。正是受过度行政管制保护而缺乏有效市场竞争，中国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事业生产效率低下而供应相对不足，构成 2003 年以来 CPI 指数上涨的主要成本推动力量。未来时期中国 PPI 指数的相对稳定以及第三产业的健康成长，依赖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事业的

行政管制改革。

3．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

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设计应该遵循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从有效需求视角给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经济学解释，主要通过调节有效需求（而不是收入分配）途径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面临高储蓄倾向这样有利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下，有必要建立以投资需求管理为轴心的需求管理政策体系，通过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实现高储蓄向高投资的有效转化，以充分积累的资本存量与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互补，支持 20 世纪中后期来临的中国老龄社会。

无论从国际标准还是从历史趋势比较，中国国民收入均具有较高的储蓄倾向。特别是 1990 年代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国民收入、国内消费需求相当于国内投资需求增长迟缓。不过，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以及最终消费比率下降在经济学意义上是部分合理的，可以同时从经济体制转型、生命周期阶段与经济波动形态多层面进行解释：

（1）向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过渡，伴随着居民收入补偿与居民积累功能的“完全化”，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当部分来自适应积累功能重新配置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实质性提高，不可能形成居民消费支出；

（2）年轻人口是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净流入劳动力市场的，在当前高收入基础上进行的正储蓄，完全弥补老年人口在既往低收入基础上进行的负储蓄，持续提升国民收入的总体储蓄倾向；

（3）在消费平滑化机制的作用下，（相当于投资支出）消费支出的顺周期（ pro-cycle）波动行为更为缓和，消费支出增长在经济扩张时期慢于投资支出增长，而在后继经济收缩时期快于投资支出增长。

促使中国国内收入最终消费比率长期或者短期下降的各种因素将逐渐消失或者反转。例如，中国经济周期从扩张阶段向收缩阶段的演化，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完成，以及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特别是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普及和完善，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降低而居民预防型储蓄动机弱化。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中国消费比率在经历长期下降后将趋于稳定。

由于二元结构条件下非递减的资本边际收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具有资本深化特征。重化工业化阶段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和资金密集的产业发展性质，必然要求大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同时，中国经济失业问题包含古典型劳动力失业问题与凯恩斯型资本失业问题，需要分别通过增加资本积累途径解决和通过增加有效需求途径解决。向投资需求倾斜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将在短期内增加有效需求而在长期内增加资本积累，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目标以及长期就业目标和短期就业目标。

依据国民收入双缺口模型，国内储蓄缺口（I - S）映射为国际贸易缺口（M - E）。不断扩大的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有着包括国内贸易发展方式、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在内的多种形成原因，然而也真实反映国内储蓄的相对过剩状况。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将缩小国内储蓄剩余（S - I）从而缩小国际贸易顺差（E - M），最终消除人民币升值的结构性原因和实现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并且将通过乘数机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自然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评论

1．需求管理的中性取向与积极操作

1990 年代以来中国财政预算出现严重的结构性赤字，税收征收没有能够充分补偿因放弃国有企业所有权或者经营权而丧失的政府非税收收入。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采取增加财政支出和税收收入的审慎政策手段组合，同时利用税收融资的财政支出乘数效应和债务融资的财政支出乘数效应来扩大国内需求，较好地兼顾财政政策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在本次经济周期扩张阶段，中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效维护财政预算周期平衡和削减国家债务负担比率。

由于缺乏生活费用调整机制（COLA）以及税收制度剧烈累进性，中国财政政策具有需求紧缩和反经济增长的内在偏斜,在长期经济增长环境下将减少制度化的实际财政支出而增加制度化的实际税收收入，对于企业家投资行为与劳动者就业行为的负面激励作用也将逐渐突出。供给主义性质的减税政策是缺乏理论和经验基础的，其短期的税收减免措施与长期的税收增加目标相违背。然而，在适应公共财政体制要求的稳定而规范的税收收入机制基本建立后，有必要抑制微观税收负担的过度累进趋势和宏观税收负担的过多增加趋势。财政预算的中性需求管理取向与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支持(pro-growth)

倾向，应该成为中国财政政策调整和改革的重要指导原则。

人民币尚未实现在资本项目上的完全可兑换性，然而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非常有限的。在2005年7月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的人民币预期升值幅度迅速向国际国内利率差异收敛，二者历时轨迹开始协同运动。人民币汇率的近似利率平价条件（IRP）反映中国资本项目的实质开放程度。资本项目管制的严格性和有效性是相对于国际资本流入套利的预期收益而言的。由于人民币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这样的市场预期已经形成，国际投机资本不仅努力规避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管制措施，而且可以延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远期交易时间。国际投机资本能够经由国际贸易项目间接流入，通过出口贸易高报（over-invoicing）与进口贸易低报（under-invoicing）而形成虚假的国际贸易盈余。

由于利率尚未自由化，价格调整性质的利率政策与数量调整性质的信贷政策内是相互独立的。在准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货币供应部分外生化。当受对冲能力限制而无法阻止国内货币供应快速增加，中国货币政策只能采取控制国内信贷规模的紧缩性操作，同时保持人民币价值的对内稳定与对外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国际资本套利策略支持中国货币政策的低利率选择，而低利率的中国货币政策能够抑制国际资本流入套利。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建立作为需求管理指导线的最高可持续增长率目标（HSGR）（highest sustainable growth rate），避免政策偏好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速度饥渴逆转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速度恐慌而导致非理性经济萧条。中国经济的生产率进步以及潜在总供给增长速度是惊奇的，本次经济扩张阶段的中国实际GDP增长速度连续突破对中国潜在GDP增长速度事前估计的普遍心理界限。在高速经济增长和剧烈结构转变时期，低估潜在总供给能力而实行非合意的紧缩性需求管理的政策风险大概率存在。面临持续扩展而即时未知的潜在总供给能力，中国经济有必要采取微撞（fine-tapping）的需求管理模式，即反复“小幅度增加总需求—等待并且观测通货膨胀反应—（若无通货膨胀加速反应）小幅度增加总需求/（若有通货膨胀加速反应）小幅度减少总需求”的操作过程，通过间歇增加总需求而探索潜在总供给前沿。

2.汇率均衡化调整过程中的政策目标算术

经过长期均衡条件修正的动态购买力平价（PPP）理论，依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济开放以及国际经济自由化的历史趋势，能够预测发展中国家实际汇率(相对传统PPP理论平价水平）是长期低估并且持续升值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指数动态性质因而

表现为由国民收入增长推进的实际汇率指数历时升值过程。

依据动态 PPP 理论的可计算形式，区分人均国民收入的高速增长情景与低速增长情景以及实际汇率与传统 PPP 理论平价比率对其国际趋势离差的全部消失情景与全部保持情景的组合类型，情景预测 2006-10 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年均升值率约为 6%而累计升值约 25%。假设在加成定价制度下国内通货膨胀主要是劳动力成本推动的，而工资成本完全由劳动技术进步吸收。在2006-2010 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年均升值 $\dot{e} = -6\%$的背景条件下，中国需求管理政策的中性取向应该符合工资、价格、汇率动态调整的政策目标算术。

（1）通货膨胀目标：参照欧洲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的 2%价格稳定目标，设定 4%通货膨胀率目标即 $\pi = 4\%$，从而通货膨胀率的国内国际差距为 2%即 $\pi - \pi_W = 2\%$；

（2）名义汇率目标：设定 4%名义汇率年均升值率目标即 $\dot{E} = \dot{e} + (\pi - \pi_W) = -4\%$, 从而 2006-2010 年间人民币名义汇率约累计升值 20%；

（3）实际工资目标：假设实际工资上涨速度延续十五计划时期的历史趋势而与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相同，设定 10%实际工资年均上涨率目标即 $\dot{w} = 10\%$，从而 2006-2010 年间实际工资率约累计上涨 60%；

（4）名义工资目标：设定 14%货币工资年均上涨率目标即 $\dot{W} = \dot{w} + \pi_N = 14\%$，从而 2006-2010 年间货币工资约累计上涨 90%。这样，按潜在 GDP 年均增长 9%而实际通货膨胀率 4%计算，2006-2010 年间国民收入中工资收入比重将保持基本稳定。

依据货币主义固定货币供应增长政策规则 $gM = \pi^* + gY^* - gV^*$，在 $\pi^* = 2.5\% \pm 0.25\%$、$gY^* = 9.0\% \pm 0.25\%$以及 $-gV^* = 5.0\% \pm 0.50\%$的假设前提下核算中国广义货币供应增长目标 gM2。其中，变量 π^* 、Y^*与 V^* 分别表示核心通货膨胀率、潜在国民收入与广义货币流通速度趋势。与上述通货膨胀政策目标比较，核心通货膨胀率目标 π^* 赋值偏低。然而，作为1991-2005 年间历史趋势的国民收入货币持有系数增长率 $-gV^*$，其外推预测却高估 2003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货币化速度。因此，中国广义货币供应增长目标 $gM2 = 17.6\% \pm 1.20\%$，对于 2006-2010 年间广义货币供应管理是有政策参考价值的。

预测历史与计量方程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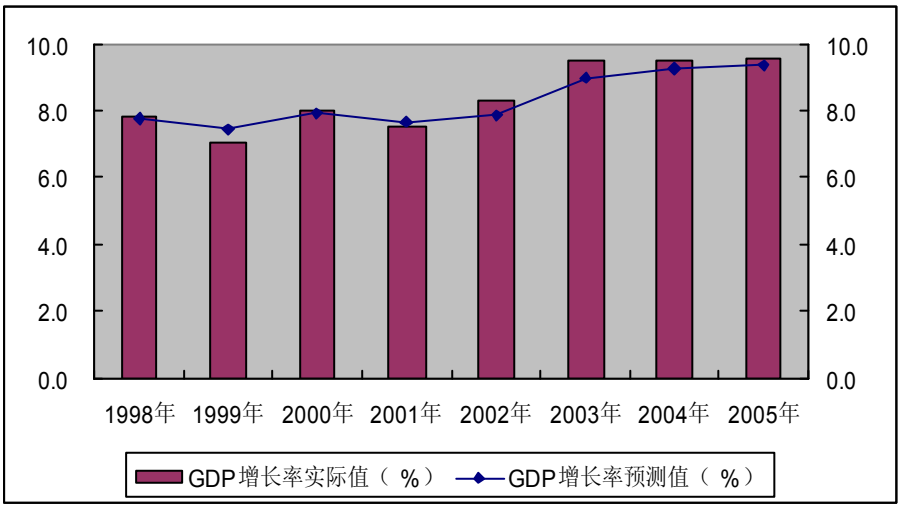
1．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精度

从 1998 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中心在每年 10 月与 11 月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研究报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蓝皮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以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公开发布，连续预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主要指标。

附表 1 和附图 1 为 1998 年以来中国 GDP 增长速度预测结果及其预测误差。国家统计局使用趋势离差法，依据 2004 年经济普查结果而调整 1998-2003 年间 GDP 年度增长速度。附表 1 类似地依据 1999-2004 年间原始 GDP 增长速度与其 2004 年经济普查调整结果的趋势比例，反向计算 2005 年 GDP 增长速度（未经普查调整）的实际值。

附表 1　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结果及其历史误差　　（%）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预测值	7.75	7.46	7.95	7.68	7.86	8.97	9.24	9.36
实际值 （经普查调整）	7.8 （7.8）	7.1 （7.6）	8.0 （8.4）	7.5 （8.3）	8.3 （9.1）	9.5 （10.0）	9.5 （10.1）	9.57 （10.2）
误差	-0.05	0.36	-0.05	0.18	-0.44	-0.53	-0.26	-0.21



附图 1　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结果图示

2．潜在国民收入核算

使用 OLS 方法拟合国民收入自回归方程 $Y_t = (\prod^{k}_{i=1} (Y_{t-i} \cdot (1 + \delta)^i))^{1/k}$，进行静态预测而建立潜在国民收入时间序列 Y_F_t。由此构造的潜在国民收入指标容纳实际经济波动的滞后效应（hysteresis），并且具有可变（但不同于 δ）的年度增长速度。当 k = 1 时，潜在国民收入退化为 $Y_F_t = Y_{t-1} \cdot (1 + \delta)$，将按样本期间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算术平均值计算潜在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不记忆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历史；当 $k \to \infty$ 时，潜在国民收入时间序列退化为 $Y_F_t = \alpha + \delta \cdot t$，将按全部历史时期实际国民收入水平的几何平均值计算潜在国民收入水平，完全记忆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历史。

选择半周期时滞 k = 5，国民收入自回归方程 $Y_t = (\prod^{5}_{i=1} (Y_{t-i} \cdot (1 + \delta)^i))^{1/5} = (\prod^{5}_{i=1} Y_{t-i}) \cdot (1 + \delta)^3$，对其在 1978-2005 年间使用 OLS 方法拟合并且静态预测，取得中国潜在 GDP 水平时间序列 Y_F_t，进而计算实际 GDP 水平与潜在 GDP 水平的相对比率，如附表 2 所示。中国经济周期的繁荣状态与萧条状态分别对应于相对国民收入 Y/Y_F ＞ 1 与 Y/Y_F ＜ 0，而相对国民收入 Y/Y_F 的历时上升与历时下降分别反映实际 GDP 增长速度高于与低于潜在 GDP 增长速度。

$$Y_t = (Y_{t-1} \cdot Y_{t-2} \cdot Y_{t-3} \cdot Y_{t-4} \cdot Y_{t-5})^{1/5} \cdot (1 + 0.094017)^3$$

（37.52931）

$R^2 = 0.995951$，adj $R^2 = 0.995951$，SE = 19.99656，DW = 0.378091。

附表 2　实际国民收入与潜在国民收入

年度	实际GDP水平 * Y	潜在GDP水平 * Y_F	相对比率 Y/Y_F
1983	147.6000	150.8360	0.978546
1984	170.0000	163.0505	1.042622
1985	192.9000	178.6691	1.079649
1986	210.0000	197.7991	1.061683
1987	234.3000	220.4576	1.062789

1988	260.7000	246.8561	1.056081
1989	271.3000	276.6017	0.980833
1990	281.7000	303.7072	0.927538
1991	307.6000	327.6016	0.938945
1992	351.4000	353.5895	0.993808
1993	400.5960	383.4469	1.044723
1994	453.0741	417.8481	1.084303
1995	502.4592	462.9800	1.085272
1996	552.7051	519.7866	1.063331
1997	604.1066	584.4219	1.033682
1998	651.2270	651.3116	0.999870
1999	700.7202	717.7844	0.976227
2000	759.5807	783.1935	0.969851
2001	822.6259	850.6751	0.967027
2002	897.4849	921.0973	0.974365
2003	987.2333	996.9840	0.990220
2004	1086.944	1083.492	1.003186
2005	1197.812	1182.928	1.012583

* 以 1978 年实际 GDP 水平为 100

3．附加时间趋势的菲利浦斯曲线

中国 GDP 平减指数时间序列 log（P）的跨时演化趋势能够以时间变量的四次线性方程 $\log(P_F_t) = \sum^{k}_{i=0}(C_i \cdot T^i)$ 模拟。这里，定义时间变量 T，1981 年 T = 1，2005 年 T = 25。

$$\log(P_t) = 4.809265 - 0.098966 \cdot T + 0.024787 \cdot T^2 - 0.001235 \cdot T^3 + 1.91E\text{-}05 \cdot T^4$$

(61.66555)(-2.485944) (4.091562) (-3.559056) (2.885775)

$R^2 = 0.987619$, adj $R^2 = 0.985143$, SE = 0.060131, DW = 0.521289

使用 OLS 方法在 1978-2005 年间估计中国实际 GDP 的指数增长方程，取得中国实际 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 gY = 0.093928。若潜在 GDP 按固定速度指数增长即 gY* = gY，使用 OLS 方法在 1983-2005 年间估计中国菲利浦斯曲线 $\pi = E[\pi] + \lambda \cdot (y - y^*)$。

$$\log(Y_t) = 4.759994 + 0.093928 \cdot T$$

(388.6866) (107.7884)

$R^2 = 0.997767$, adj $R^2 = 0.997681$, SE = 0.037247, DW = 0.492616。

$$\Delta\log(P_t) = 0.029846 + 0.480958 \cdot \Delta\log(P_{t-1})$$

(1.911408) (2.569024)

$$+ 0.901123 \cdot (\Delta\log(Y_t) - 0.093928) + [MA(1) = 0.895894]$$

(2.644196) (8.023811)

$R^2 = 0.764506$, adj $R^2 = 0.725257$, SE = 0.026784, DW = 2.023628。

附加以时间序列 P_F 为代表的价格历史趋势并且采取潜在 GDP 时间序列 Y_F，使用 OLS 方法在 1983-2005 年间估计中国菲利浦斯曲线 $\pi - \pi^* = E[\pi - \pi^*] + \lambda \cdot (y - y^*)$。与传统卢卡斯总供给函数 $\Delta\log(P) = f(\Delta\log(Y))$ 比较，中国卢卡斯总供给函数修正形式 $\Delta\log(P/P_F) = f(\Delta\log(Y/Y_F))$ 具有良好的统计显著性能和解释能力。

$$\Delta\log(P_t/P^*_t) = 1.135820 \cdot \Delta\log(P_{t-1}/P^*_{t-1}) - 0.636650 \cdot \Delta\log(P_{t-2}/P^*_{t-2})$$

(10.22269) (-6.770626)

$$+ 0.345853 \cdot \Delta\log(Y_t/Y^*_t) + [MA(1) = -1.552172]$$

(6.860421) (-4.343217)

$R^2 = 0.898119$, adj $R^2 = 0.881139$, SE = 0.014385, DW = 2.373022。

报告二：稳健货币政策的中性取向和积极操作

通过国内价格水平、货币增长率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等指标考查来当前的货币政策，并对今后货币政策调整的方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根据宏观经济形势 2006 年上半年以来，中央银行的目标是通过稳健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投资过快增长得到抑制的同时，中国经济目前已经显露出内需不足的潜在风险。价格水平走低也降低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客观上促进了外需的增长，因此需要考虑对今后一段时期货币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除此之外，我们还讨论了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资本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这无疑为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施加了新的约束条件。调整的思路可以概括为“稳健货币政策的中性取向和积极操作”，以发挥货币政策在平滑经济波动中的作用，具体政策选择包括调低银行间货币市场和贷款利率的同时再次调高准备金率等等。

一、2006 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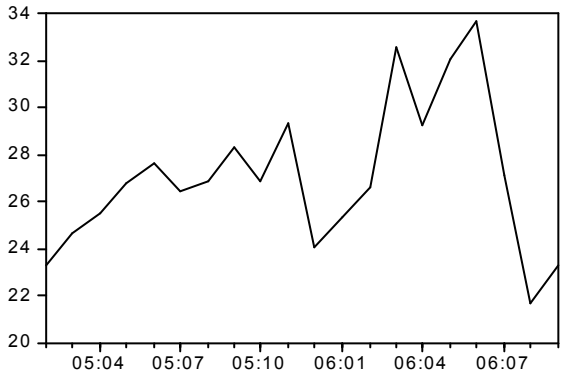
2006 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和贷款余额呈现快速增长的形势。在中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贸易顺差迅速增长意味着通过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迅速增加。同时旺盛的投资需求也带动了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的迅速增张。针对这一形势，当前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缩货币供给并抑制信贷过快增长。中央银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和本外币政策协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着力优化信贷结构。”[1]主要的政策包括在公开操作市场上加大对冲操作力度；两次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抑制贷款需求；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加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大“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力度等等。各宏观变量最新数据显示，稳健货币政策效果显著。

（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2006 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图一）表明 2006 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远高于 2005 年的水平，3 月份到 6 月份连续 4 个月达到或超过 30％的水平，6 月份最高为 33.69%。但是自 7 月份以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呈现出迅速下降趋势。固定资产投资 7 月份同比增长率为 27.15％,8

[1]《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二〇〇六年第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第 2 页。

月份再次下降为 21.63%，9 月份略有回升，达到 23.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三个月内由 33.69%下降为 23.3%，下降幅度达到 10 个百分点，足以反应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力度之强。投资需求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要调整中国经济增增过分依赖净出口的背景下，内需尤其是投资增长对拉动总需求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投资增长率的迅速下降必然会反映到总需求的变化当中，甚至影响到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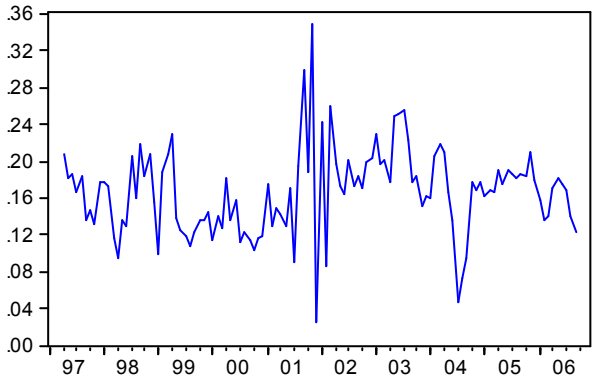


（图一）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2]

（二）货币供应量增速下降

考察货币（M2）增长率的变化情况，（见图二）。2005 年末到 2006 年初，货币环比增长出现较快速度下降。2006 年 3 月份货币增长率仅为 13.5%，此后保持缓慢升高的趋势。5 月份达到最高的 18%之后再度出现下降趋势，8 月份降至 14%，9 月份降至 12.4%。根据历史经验，货币增长率较为适度的区间在 15%－20%之间。因此我们大致判断 2006 年年初货币政策处于相对紧缩的状态，货币增长率较低。5 月份之后货币增长率再度出现的下降趋势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货币供应量持续低增长可能导致总需求紧缩、价格水平下降等一系列后果。

[2] 官方公布的投资数据为 1、2 月份合计值，本图中用直线简单连接 2005 年 12 月和 2006 年 2 月份的数据。数据来源：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图二）货币（M2）增长年率[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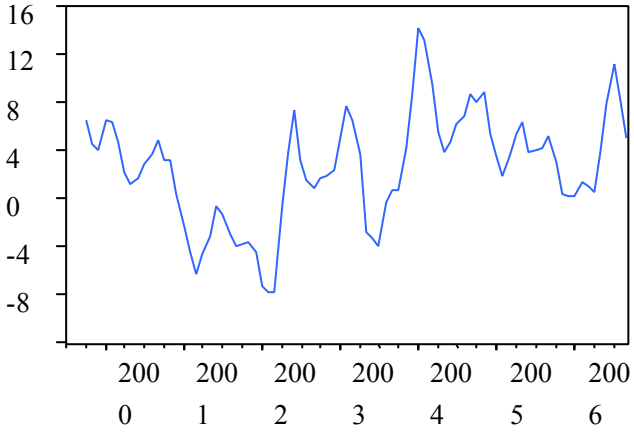
（三）价格指数暗示总需求增长后劲不足

要全面考察货币政策，除了关注贷款和货币增长速度本身之外，还应该着重考察物价水平的变化。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情况不仅是反映整个经济总体状况的标志，同时也是衡量货币供给增长率高低和需求状况最直接的指标。考虑到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的时滞，如果价格增长速度出现下降的趋势，则表明此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较紧；相反如果价格增长速度出现上升的趋势，则表明此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较松。通过价格指数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可以大致的判断货币政策是否处于适度的区间以及未来应该调整的方向，作到全面权衡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防止政策调整“过犹不及”。

1、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印证投资需求下降。

作为对固定资产投资变化的间接反映，我们首先考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变化，（见图三）。工业品出厂价格呈现出了同固定资产投资类似的变化趋势。2006 年上半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6 月份达到最高，7 月份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由于投资需求的对象主要是工业产品，同时考虑到需求变化到价格调整之间的时滞，资产需求的环比数据也许在此之前就已经表现出下降趋势。在考察货币政策时，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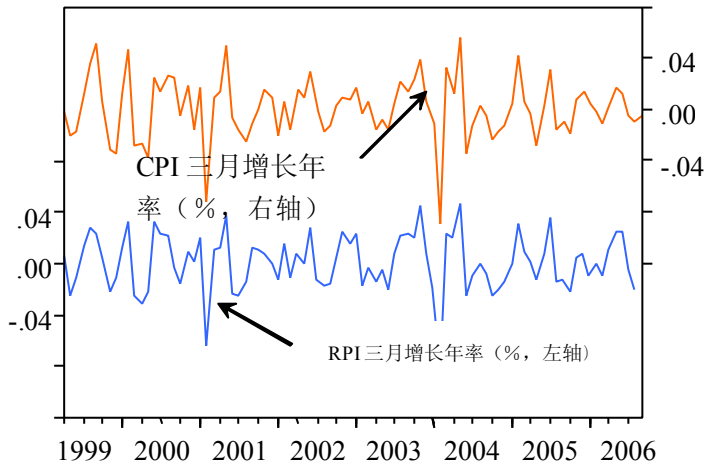
[3]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http://www.pbc.gov.cn。



（图三）PPI 增长年率[4]

2、消费价格（CPI）和零售价格（RPI）显示消费需求相对平稳，但有潜在下降趋势。

进一步考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零售价格指数，我们发现消费价格指数和零售价格指数也存在下降的潜在风险。2005 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零售价格指数在狭窄范围内波动。2006 年 7 月至 9 月，剔除季节因素后的 CPI 指数增长年率连续负增长。从 5 月份的 1.6%降至 8 月份－1%，9 月份上升至－0.5%。RPI 指数表现出大致相同的趋势，2006 年 6 月份剔除季节因素后 RPI 年增长为 2.5%，7、8 月份连续出现负增长，8 月份降至－2%。综合消费者价格和零售价格指数的情况，我们发现相关价格水平总体增长速度减慢。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问题就是价格水平负增长持续的时间。如果货币政策进一步趋紧导致总需求不足，价格水平持续负增长就会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见图四）



（图四）剔除季节因素后 CPI、RPI 增长年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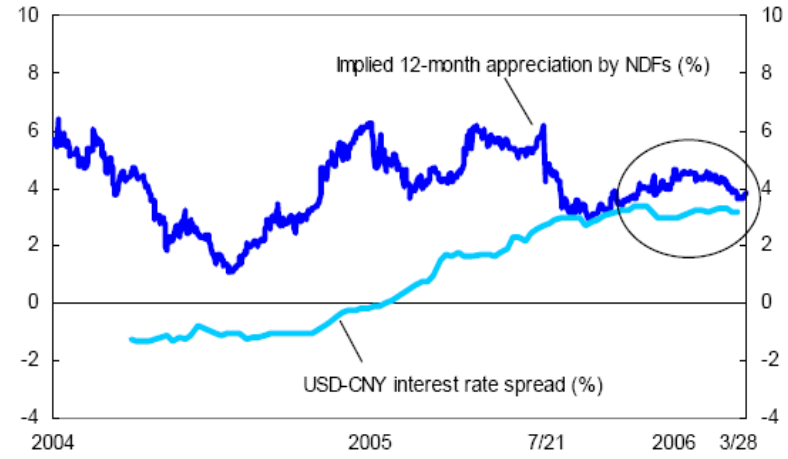
[4] 在本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各变量的年度增长率均由剔除季节因素后三个月增长率折算得到。

二、货币政策面临资本流动挑战

在国际经济领域存在一个著名的“三元悖论”，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各国充其量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在资本自由流动背景下，如果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国际收支赤字将导致本国货币供应量减少，国际收支盈余将导致本国货币供给增加，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持汇率稳定而非国内市场均衡，从而丧失了货币政策作为主要宏观政策工具的作用。

我们来考察中国的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问题。按照政府官方的规定，中国资本项目并未完全开放。那么中国资本流动状况或者资本管制的实际效果又是怎样的呢？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适当的指标来衡量尚未开放项目下国际资本的流动情况，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间接指标来考察中国资本项目的实际开放程度。比如研究外汇储备增长与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两项之和的差额，这一差额反映了实际流入外汇与正常外汇收入的差额。其次我们还可以研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中“净误差和遗漏”项目的规模和符号。从2002年起，“净误差和遗漏”项目由负值转为正值，并且规模不断扩大。虽然“净误差和遗漏”包含正常的误差和遗漏项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货币当局监管之外的国际资本的流向及其规模。规模不断扩大的正“净误差和遗漏”项目暗示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入中国的资金正在逐步增加。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NDF[5]与无抵补利率平价远期汇率理论值来间接考察资本的流动情况。在资本流动性较高的情况下，NDF与无抵补利率平价远期汇率应该近似相等；相反在资本缺乏流动性的情况下，由于外资无法进入人民币即期市场投机，所以NDF与通过无抵补利率平价计算出来的人民币远期汇率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误差。当NDF向无抵补利率平价远期汇率收敛时，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资本的流动性在不断增强。（图五）显示2006年以来，NDF和利率平价远期汇率呈现正逐步出收敛的状态。

[5] 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on-Delivery Forward)，主要用于实行外汇管制国家的货币。其作法是供求双方基于对汇率的不同看法，签订非交割远期交易合约，该合约确定远期汇率，合约到期时只需将该汇率与实际汇率差额进行交割清算，结算的货币是自由兑换货币（一般为美元），无需对NDF的本金(受限制货币)进行交割。



Sources: CEIC, Bloomberg and Bank of America estimates.

（图五）人民 NDF 与远期汇率[6]

中国目前货币政策的现实是既要考虑到国际收支平衡，又要兼顾国内经济平稳。国际资本的跨界流动性日益增强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断受到挑战，货币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诸如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等大经济体的影响。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利率差额日益成为影响国际间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国货币当局提高利率，保持正的国内国际利差，这样虽然起到抑制经济过热，实现国内市场均衡的作用，但是正的利差又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一方面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会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客观上也削弱了升息的实际效果。如果中国货币当局降息，保持负的国内国际利差，虽然抑制了国际资本流入，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是客观上对国内采取了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容易导致经济过热。因此利率工具往往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在实现国际收支均衡（国内市场均衡）的同时又加剧了国内市场（国际收支）的非均衡，客观上增加了货币政策制定的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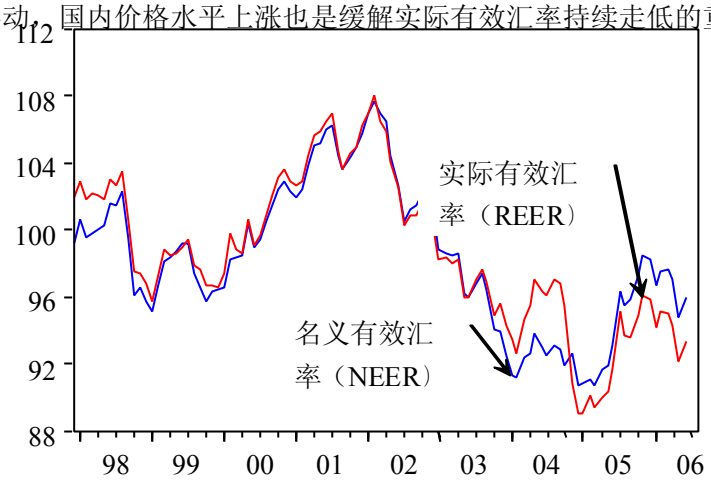
三、近期货币政策思路，稳健货币政策的中性取向和积极操作

从短期来看，总需求是影响保持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在构成总需求的三大要素中，除非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消费是相对稳定的部分。据宋国青（2006）、张军 (2006)等研究成果，近年来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 GDP 中的比例迅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居民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非常有限，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对拉动中国经济具有特殊意义。短期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是协调净出口和投资的关系。给定总需求增长目标，净出口和投

[6] 转引自美洲银行报告《Foreign Exchange Strategy》，2006年4月7日。

资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要压低净出口增长率，必须保持投资较快增长；同样如果要降低投资增长率则必需要实现净出口的快速增长。

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所造成的出口过快增长、外汇储备过度累积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人民币名义汇率目前已经实现小幅下调，但是作为最终影响国际贸易的实际有效汇率不仅受名义汇率的影响，还受各国物价水平变化差异的影响。考察 2006 年以来中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情况发现从 2005 年末截止到 2006 年 6 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呈现下跌趋势，（见图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无疑会推动中国出口增长，加剧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外汇过度积累。进一步分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关系，我们发现 2005 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一直低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物价水平增长速度低于主要贸易伙伴国水平。除了人民币名义汇率小范围浮动，国内价格水平上涨也是缓解实际有效汇率持续走低的重要途径。



（图六）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7]

从宏观经济角度观察，我们发现目前中国经济目前存在外需进一步扩大，而内需又存在潜在不足的风险。为了避免外需增长过快而内需相对不足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需要对此前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而从货币体系的情况看，一方面由于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可能会导致基础货币增长过快和商业银行流动性过高，另一方面广义货币的增长率却偏低。货币政策的具体调整应该围绕宏观经济目标，并结合货币体系的特点展开，我们认为调整思路可以从稳健货币政策的中性取向和积极操作角度入手。

就银行间货币市场而言，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可能导致基础货币增长过快和商业银行保有过多流动性进而导致贷款增长过快、不良贷款数量上升从而导

[7]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IFS），www.imf.org。

致经济过热和金融风险上升。从商业银行方面抑制贷款过快增长，中央银行可以有不同的政策组合选择，重点在削弱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和贷款意愿。例如通过发行央行票据等政策加强中央银行冲消干预和公开市场操作的人民币回笼力度。但是这些操作在减少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同时可能导致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升高，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加剧中国经济外部不均衡。此外中央银行也可以考虑调整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实现压缩商业银行多余的流通性的目标。

针对货币增长率偏低，总需求潜在不足的情况，可以考虑推动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适度回升，缓解目前内需潜在不足的风险。货币增长率提高还有利于缓解由于实际有效汇率下降造成的出口需求增长过快压力。对于利率而言，从长期增长的角度以及国际经验比较出发，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然会拉动名义利率在长期内呈现升高的趋势。但是作为宏观政策工具，我们认为短期内保持目前名义利率基本稳定而非进一步升高对当前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保持名义利率稳定在目前水平可以避免因为投资大幅波动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此外还可以促进货币增长率回升，避免经济剧烈波动。考虑到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未来调低利率的可能，从改善外部经济不平衡的角度衡量，未来也不宜进一步提高国内利率水平。对于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局部贷款增长过快，货币当局可以考虑运用“窗口指导”等工具调节商业银行信贷政策。

我们建议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策取向，避免进一步收紧，保证总需求的适度规模，避免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从更长期的角度看，应该对现行的汇率形成制度和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一方面是将外汇储备逐渐向民间分流，降低央行的管理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解决当前中央银行政策操作中面临的困境，保证央行更好的履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职能。

参考文献：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二〇〇六年第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Foreign Exchange Strategy》，美洲银行，2006 年 4 月 7 日。

《国内收入分配偏斜导致消费率下降》，宋国青，《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 7 期，2006 年 10 月 29 日。

《中国企业为什么储蓄这么多？》，张军，《经济观察报》，2006 年 11 月 6 日，第 49 版。

报告三:

优化财政税收体制，支持长期经济增长

“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进入“十一五”时期，2006 年上半年经济稳步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从长期来看，企业的供给是支持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但是，目前民间投资有待加强，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有待改善，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成，这不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在保持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应该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与民争利到让利民间；同时优化税制，降低企业的总体税负和边际税率，提高企业的投资激励，提供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促进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进而在增长中解决发展问题。总体上，我们强调通过市场导向的改革，在健全的现代市场经济框架下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一、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面临的若干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资料，2006年前三季度GDP为 141477亿元，同比增长10.7%，比上年同期增长0.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71942亿元，同比增长27.3%，比上年同期增长1.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62221亿元，同比增长17.2%，比上年同期增长0.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5091亿元，同比增长13.5%，比上年同期增长0.5%；进出口总额为1272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比上年同期增长0.6%。就短期而言，宏观经济形势依然表现良好。从长期来看，要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就必须改善供给，就必须拥有更多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1、民间投资有待加强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1），我们发现从1993年到2003年的八年间（缺1999、2001和2002年数据），在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一半左右，高于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是投资的主体是政府，不是民间；是国有经济，不是民营经济。表2表明，从实行分税制的1994年到2005年，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明显高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其他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较小。根据12年的数据计算，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大约占了近一半。在国有经济中，中央所属项目又占了很大比例，平均起来大约为三分之一。这充分说明，目前中国经济总体上仍然是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政府投资占了主导作用，民间投资还有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应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当然更是投资的主体。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断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性和基础性行业。表2也表明，我国的非国有经济在投资方面的比重不断增长，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远来看，我国的非国有经济应该逐步成为投资的主体，但是眼前的现实离这个目标依然有些距离。这说明，还存在一些制约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的体制性因素，从而阻碍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表1：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份	总投资	总消费	净出口
1993	8.47	5.83	-2.78
1994	5.84	4.82	2.64
1995	5.94	5.31	1.15
1996	3.29	5.76	-0.06
1997	3.01	3.09	2.44
1998	2.97	3.88	1.06
2000	1.85	5.19	1.05
2003	8.1	3.43	0.7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 2：按经济类型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年份	总额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	其他经济
1994	17042.1	0.564191	0.161887	0.115631	0.15829
1995	20019.3	0.544385	0.164311	0.127887	0.163407
1996	22913.5	0.523979	0.15936	0.140144	0.17652
1997	24941.1	0.524905	0.1544	0.1375	0.183196
1998	28406.2	0.541054	0.14758	0.131816	0.179549
1999	29854.7	0.534181	0.145324	0.140537	0.179962
2000	32917.7	0.501384	0.145864	0.143066	0.20969
2001	37213.5	0.473135	0.141846	0.145904	0.239118
2002	43499.9	0.433964	0.137642	0.149867	0.278527
2003	55566.6	0.389821	0.144142	0.138934	0.327103
2004	70477.4	0.355115	0.141403	0.140195	0.363287
2005	88773.6	0.334186	0.134833	0.156472	0.374509

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

2、现行税制对企业发展的制约效应仍未消除

除了增长的动力有待优化，我国的政策环境也有待改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国税收增长过快，宏观税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税收结构制约了长期经济增长。

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我国总体税负偏高，税收增长过快，高税收部分抵消了稳健财政政策的效果

衡量总体税负的指标是宏观税负，即一定时期一个政府所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 GDP 的比重。鉴于我国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在财政收入之外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因此在“税收收入/GDP”、“财政收入/GDP”和“政府收入/GDP”这三个常用指标中，“政府收入/GDP”最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实际宏观税负。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由当年的 16.4%直线上升到 2000 年的 25.1%，明显超过了发展中国家 20%的世界平均水平。

就税收增长的速度而言，从 1994 年到 2004 年，我国税收平均增长率为 17.1%，大大超过同期 GDP 平均增长率 13.6%；税收弹性即税收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的比值在大部分年份都超过了 1，甚至一度达到了 3（见表 3）。一方面，政府多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频繁降低利率，不断增发国债。但是，另一方面税收增长又高居不下。过快增长

的税收部分抵消了稳健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研究表明，边际宏观税率每增加 1%，经济增长率就降低大约 3.87%。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表 3：GDP 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比较（1994－2004）

年份	GDP	税收收入	GDP 增长率	税收增长率	税收弹性
1994	46759.4	5126.88	0.3501	0.2048	0.585063
1995	58478.1	6038.04	0.2506	0.1777	0.709138
1996	67884.6	6909.82	0.1609	0.1444	0.897586
1997	74462.6	8234.04	0.0969	0.1916	1.977747
1998	78345.2	9262.8	0.0521	0.1249	2.396165
1999	82067.5	10682.58	0.0475	0.1533	3.226548
2000	89468.1	12581.51	0.0894	0.1778	1.98844
2001	97314.8	15301.38	0.087704	0.21618	2.464884
2002	105172.3	17636.45	0.080743	0.152605	1.890009
2003	117390.2	20017.31	0.11617	0.134997	1.162057
2004	136875.9	24165.68	0.165991	0.207239	1.248497
平均	86747.15	12359.6809	0.136192	0.171411	1.686012

说明：（1）GDP 和税收收入的计算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2）数据根据当年价格水平计算；

（3）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

（2）我国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偏高

目前我国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法定税率为 17%。如果换算成国际通行的“消费型”，实际税率为 23%。而西方国家的增值税一般都在 20%以下，因此我国的增值税显著偏高。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 33%，高于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与实行四级超额累进税率的美国的最高一档边际税率持平。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企业在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总体处于弱势地位，但是我国企业的税负却高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这将加重企业的负担，弱化企业的边际投资激励，也不利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

（3）我国内外资企业之间税负不平等，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壮大

根据现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所得税的税基和实际税率两个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从税基上看，外资企业在成本费用补偿方面明显占了优势。例如，现行税法规定，外资企业的工资支出允许在税前全额扣除，而内资企业却不行，这意味着内资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此外，内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业务招待费和捐赠支出等项目的应税比例都远比外资企业要低。从实际税率上看，虽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名义税率相同（33%），但是外资企业享受着广泛的税收优惠。比如，在生产性、能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行业的外资企业，普遍享受“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优惠政策，内资企业并无此权利。据估计，目前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负大约高出外资企业 10 个百分点。这种不平等的税收政策，加重了内资企业的负担，不利于内外资企业之间公平竞争，也与我国加入 WTO 之后的“国民待遇”原则相悖。

3、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能转变尚未完成

由于市场经济中日益细化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以及天然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不可能

长期代替企业和居民投资或消费，其投资或消费的效率不如企业和居民，并且会对民间投资造成“挤出”效应。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和居民是主体，政府是市场的管理者和服务者。良性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由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作为主要动力驱动的。政府尤其不应该与民争利，通过对高利润行业进行管制来获得垄断利益，甚至直接参与营利性业务。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例如投资于基础设施，以及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制度。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政府职能正在逐步理清，但是职能转变尚未完成。一方面，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干预过多，对许多行业设置了进入壁垒。一些重要的竞争性领域，比如汽车制造、保险和电信，外资可以以各种方式进入，但是民营企业却难以进入，这有悖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也有悖于政府的职责。另一个方面，政府手中掌握了多数资源，但是很明显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不会高于企业的资源。除了占有相当于GDP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之外，政府还有庞大的预算外收入。特别是地方政府，光是卖地和行政性收费就收入不菲。根据有关专家计算，2004年这两项的预算外收入高达10473亿元。如果再加上中央转移给地方的收入8000亿元，以及预算内的财政收入11893.37亿元，2004年全年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总财力达到30367亿元，占当年GDP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从投资效率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尽可能地“藏富于民”。

二、通过优化财税体制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在制约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三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实际上都与第三个问题直接相关。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政府主导型，所以政府职能转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提，而财税体制改革将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具体而言，我们建议：

1、转变政府职能，从与民争利到让利民间

在像美国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的主要作用体现为“无形之手”，即在自由企业制度的基础上，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充当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我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中，还是一个转型经济。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既不能充当“无形之手”，对经济放任不管；也不应该充当，直接参与营利业务，与民争利。转型时期政府的合理定位应该是“扶持之手”，即一方面提供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引导企业成为市场主体。

具体地说，政府应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中国应该从过去的“大政府、小社会”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政府应该让利于民，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同时放松行业管制，让民间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力量，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公平竞争，采取鼓励企业家创业和企业创新的财政税收政策，在竞争中培育中国民营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政府应该把主要财力用于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建设。表4显示，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稳步增加，并且增长速度也很快。这正是转变政府职能的良机。政府完全可以将主要财力用于一些企业不愿意或者不能承担的基础性建设项目，例如“新农村”建设。根据专家估算，政府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户这四项基本制度建设投入的财政成本每年大约为1000亿元，它占2005年全国财政支出33708亿的3%，相当于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182300亿的0.55%。如果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帮助农民进一步减轻负担，那么农村市场的启动就

有很大的希望，内需就有望扩大，从而长期增长的需求方面就有了保证。

表4：财政收支与GDP的比较

年份	财政收入（亿元）	财政支出（亿元）	收入增长速度（%）	支出增长速度（%）	收入/GDP（%）
1994	5218.10	5792.62	20.0	24.8	11.2
1995	6242.20	6823.72	19.6	17.8	10.7
1996	7407.99	7937.55	18.7	16.3	10.9
1997	8651.14	9233.56	16.8	16.3	11.6
1998	9875.95	10798.18	14.2	16.9	12.6
1999	11444.08	13187.67	15.9	22.1	13.9
2000	13395.23	15886.50	17.0	20.5	15.0
2001	16386.04	18902.58	22.3	19.0	16.8
2002	18903.64	22053.15	15.4	16.7	18.0
2003	21715.25	24649.95	14.9	11.8	18.5
2004	26396.47	28486.89	21.6	15.6	19.3
2005	31649.29	33930.28	19.9	19.1	17.3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2、控制宏观税负，适当降低边际税率

从收入的角度看，税收收入依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但是，我国政府还有近一半的预算外收入。如果按照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计算，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超过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尽管增加的税收一部分来自于征税效率的提升，但是高税负给新增经济活动带来的负担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我国连续几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负债占 GDP 的比重已经接近 3%的国际警戒线。因此必须控制政府支出的总体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各种政府支出中，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明显偏高。从1994 年到 2003 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平均比重高达 16%以上，并且总额增加了 4 倍。如何严格控制政府预算，降低政府行政管理费，减少腐败性支出，是一个与长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艰难课题。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支出越大，名目越多，监督越少，政府官员腐败和寻租的空间越大。国际经验和理论研究都表明，政府的腐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毒药。从征税效率的角度看，名义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的动机越大，并且纳税人和征税官员合谋进行腐败的概率也越大，这会降低征税的效率。考虑到中国目前公民的工资外收入通常不经过银行账户，收入的规范化和网络化管理尚待时日，因此征税效率会更低。

最理想的税收制度应该按照纳税人的实际能力来负担税收，能力相同的人应该纳同样多税，这是所谓的“横向公平”。但是由于能力属于纳税人的私人信息，因此在纳税人和政府（征税机构）之间就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信息不对称给税收征管的效率扭曲，政府应该逐步降低各种税收的累进程度。例如，2001 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在任期内大幅削减总额高达 1.6 万亿美元的税收，重点是简化个人所得税税制，将最高边际税率从 39%降低到 33%。

但是，我国目前主要税种的边际税率依然较高。根据《福布斯》中文版在 2005 年7月号的报道，在全球 52 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税负痛苦指数是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

主社会保险、雇员社会保险和增值税（或销售税）最高法定税率直接加总。我国的财产税为零，其他各税依次为企业所得税 33%、个人所得税 45%、雇主社会保险（即公司缴纳的社保金）44.5%、雇员社会保险（即个人缴纳的社保金）20.5%，增值税 17%，最高边际税率直接加总得出税负指数为 160。尽管税负痛苦指数没有考虑平均税负和税收结构，但是它至少表明我国的边际名义税率是相当高的。

在几种主要的税种中，增值税是政府主要税收来源，它的问题也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它对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中所含税金不予抵扣。换算成国际通行的消费型增值税，我国增值税的实际税率高达 23%。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我国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额累进，每级税率分别为 30%、40%、50%和 60%。我国企业所得税分三档，分别为 18%、27%和 33%，最高档边际税率也属世界最重。我国个人所得税按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从最低档的 5%到最高档的 45%。总体上看，我国上述主要税种的边际税率高于世界同类国家平均水平，应该适当降低边际税率。从供给的角度看，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利润，有利于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有利于鼓励企业进行自主技术创新，从而为启动民间投资提供制度保障。事实上，在实行增值税的 100 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因此我国应该尽快与国际接轨。

3、优化税制，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

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健全，各种经济形态开始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应规范各种预算外收入，尽可能将各种行政性收费和其他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或政府收入的比重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 15%以下。否则，一边降低边际税率，一边提高收费，导致减税的政策效应被抵消。考虑到税收的调节功能，为了减少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宜在适当时机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税、财产税等新税种。

在税制方面，应该尽快实行内外资企业“两税合并”。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差异太大，不利于民族企业公平竞争，不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与“国民待遇”原则相悖。建议人大常委会尽快审议以两税合并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后的税率可以定在 15－20%。为了缓解对吸引外资的冲击，可以规定一个五年的缓冲期。新税制要规范税前扣除，取消计税工资规定，提高折旧率，减少直至取消各种税收优惠。此外，对于创业型企业，除了高科技企业之外，普通企业也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便鼓励企业家创业。

三、小结

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除了建议保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变政府的“攫取之手”为“扶持之手”，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税收政策。1994 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偏低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偏低。因此，当时确定的税制很大程度上是要发挥税收的收入功能。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实力稳步上升，GDP 总量名列世界前五名，全国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也明显增加，应该考虑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特别是税收应该为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服务。根据著名的“拉弗曲线”，降低边际税率后，由于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会上升，因此税基会扩大。税基扩大，总财富增加，总税收也完全能够增加。当然，在短期内总体财政收入可能会略微下降，但是我们将得到更合理的、与国际接轨

的税收体制。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英国、德国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目前纷纷进行不同程度的税制改革，主导思想就是优化税制，扩大税基，降低边际税率，以便增强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就我国而言，从微观机制上讲，给定行业平均利润率，边际税率高低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边际报酬。从宏观上讲，平均税率和宏观税负会改变企业的投资预期，总供给会受到影响，社会总产出也将随之变化。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降低利率、增加政府投资并非长远之计，而合理改革税收制度，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则可以为中国经济的长期良性增长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安体富，2002，“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政策取向”，《经济研究》，第2期
安体富、王海勇，2005，“论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的合并”，《税务研究》，第3期
郭庆旺、吕冰洋，2004，“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8期
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和相关年份统计年鉴
陕西省税务学会课题组，2006，“我国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工作论文
新华网，2006，“北大教授报告称地方政府今年卖地超1万亿”，11月1日电
曾晟，2003，“当前我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减税和减费政策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第5期
张启良、曾纪发，2006，“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探讨”，中国统计信息网

报告四：

模式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183085亿元，年均递增7.9%，其中1979—2005年年均增长9.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跨过2万亿美元台阶，跃居世界第四位，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由2001年的4.2%提高到2005年的5.0%。人均GDP则由1952年的119元提高到2005年的14043元（1714美元）。外贸增长迅速，到2005年底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仍然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为基础。十五期间，国内需求增长迟缓，占GDP份额与对GDP增长贡献均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逐步转向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以低成本为基础的出口需求。从供给来看，中国产业供给呈现重化工业逐步加深趋势，但主要集中在原材料行业，制造业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一定支撑作用，出口扩张主要建立在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基础上，主要以外商直接投资控制的加工贸易方式为主，高新技术和机电设备出口呈现典型的外商主导局面，缺乏核心竞争力。

尽管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从中期来看仍然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但在长期，现有模式可能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陷阱。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仍存在制度改进效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能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现有人口结构在未来的生产性可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劳动力的低成本、世界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利，从中期来看，粗放型经济增长仍然能保持高速度。从长期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下降、人口逐渐老龄化、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粗放型增长是难以为继的，有可能出现粗放型经济增长陷阱。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必须在中期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积极推行长期的模式转变。

发达国家目前已建立集成创新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为避免成为核心发达国家集成创新增长模式中的边缘，中国有可能利用大国特殊的消费环境与巨大的市场规模进行自主创新，转变自身的发展模式。

一、粗放型增长模式仍然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基础

1、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迟缓，经济增长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的持续扩张

从总需求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近 20 年来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六五”——“十五”时期 GDP 主要构成以及表现出明显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大规模的消费需求引导，以及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期转变为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在 GDP 中的构成逐步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在 GDP 中的构成逐步上升。与此相适应，GDP 各主要构成部分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十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急剧上升，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的。

表 1、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 1981-2005 (%)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占 GDP 的份额 (支出法)[a]					
居民消费	52.2	51.0	46.5	47.2	42.6
政府消费	14.0	12.5	12.8	12.2	13.3
固定资产投资	28.1	29.2	33.7	35.0	40.2

出口	7.9	12.7	19.0	20.1	28.3
净出口	-0.3	-0.4	1.0	3.0	2.8
对 GDP 增长的贡献[a]					
居民消费	53.6	47.5	44.4	51.8	29.1
政府消费	12.4	11.2	11.0	16.3	14.7
固定资产投资	31.2	21.9	38.7	40.0	47.4
出口	12.7	22.8	23.6	26.5	43.7
净出口	-8.3	9.2	1.2	4.0	6.3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5》、《中国统计摘要 2006》。

a: 因为没有考虑存货，各项相加不等于 100%。

2、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攀升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重化工化

中国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持续扩张的拉动下，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了持续的增长，同时也必然对产业结构变化与升级带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在缺乏消费支持的情况下表现为生产能力和规模的扩张，而较难提供推动产业升级的内源动力，出口拉动下产业结构的提升则受到出口结构的制约。

我们采用定性投入产出方法，即通过设定一种过滤值，把产业间有重要影响的完全联系表现出来。利用这种方法，分别根据 1992 年、200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了计算。从 1992 年、2002 年中国产业完全联系系数的对比可以看出 10 年来我国产业联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的产业关联显著下降，对其他产业支持的重要性减弱了；能源行业影响提升了，而且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某些原材料生产行业和运输业；整个制造业在大的方面变化并不明显，制造业内部重工业的原材料行业，主要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仍然是整个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产业，但相比于 1992 年，包括化学工业、机械设备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等产业关联提升，表现出重化工业的推进，以及电子技术应用的提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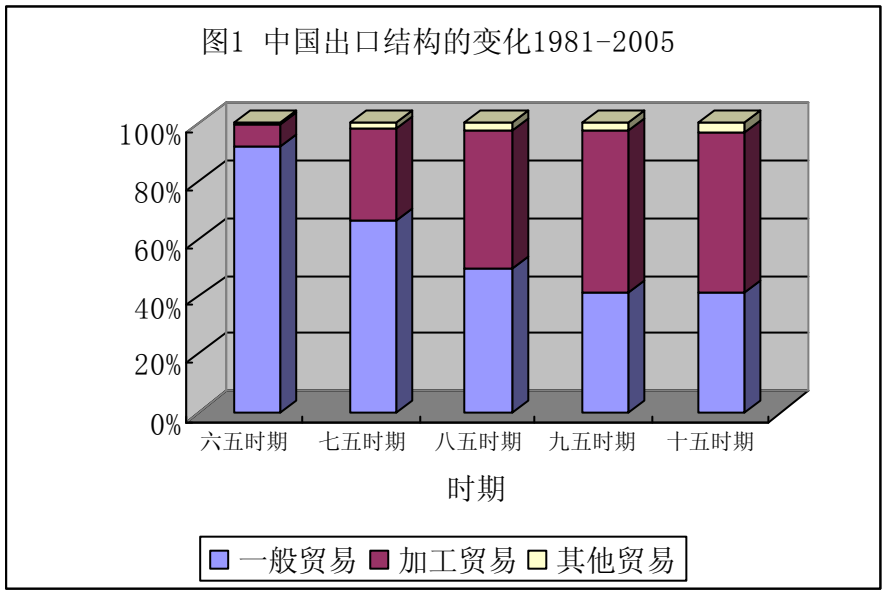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产业结构已经进入重化工业逐步加深的阶段，但主要集中于原材料等行业，制造业内的相互联系及其对整个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实际上，伴随市场化与改革开放的推进，需求的扩张带来供给能力的形成和产业的相互推动，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推动生产能力的变革，以及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等等，使得中国经济在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同时产业基础逐步增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但缺乏国内消费为基础的良性的互动和自发的技术创新，仅仅依靠规模的扩张，离

真正的制造业强国还很遥远。

3、持续出口需求增长主要表现为低劳动成本的加工贸易方式

出口需求的持续增长，对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所面临的消费需求不足，不仅在相对，也在绝对的意义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但是，中国近年来出口的扩张主要建立在低廉价劳动的比较优势基础上，表现为加工贸易为主，而缺乏自有技术的提升。

中国的 GDP 增长自 1990 年以来到 2005 年年均增长率达到 10%，而年均出口增长率按美元计算达到 17.5%。中国占世界出口的份额从 1990 年占 1.8%，到 2005 年占到6.5%，出口排名也从 1990 年的第 15 名，上升到 2003 年世界排名第 4 位。在出口结构上，初级产品出口份额逐步下降，制成品出口份额逐步上升，1990 年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出口两者各自所占的比例为 25.6%和 74.4%，到 2005 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则为 6.4%和 93.6%。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出口趋于下降，而加工贸易出口比例上升，并且这一变化最为显著的是 2000 年前，2000 年以后，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之间的比例则大致稳定在各占 41%与 55%左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6》

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推动的，2005 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 58.4%。从贸易方式来看，2004 年加工贸易出口中，外商独资占 55.7%，中外合作占 25.5%，国有占 13.5%。据海关统计，2004 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国高新技术出口比重为 87.33%，其中加工贸易方式出

口占比为 93.28%，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 42.69%；外商投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为 73.4%，其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占比为 90.55%，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 70.1%。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对外出口不仅在规模上增长迅速，结构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的对外出口结构上的变化从属于跨国公司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的调整过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占主导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方式，表明由于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中国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地而位于发达国家的产业链低端。

二、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潜力与面临的挑战

正是在日益增强的依赖于投资驱动和低劳动成本的出口拉动下，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未来能否持续，既取决于现有条件，也取决于在现有条件下发展模式能否转变。

1、粗放型增长方式在中期内仍可持续，经济可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潜力正来自于增长本身，现有增长模式在带来种种问题的同时，也不断再生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的条件。从中期来看，以固定资产投资和低劳动成本的出口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仍可持续，保持现有潜在增长率是可以实现的。

政府主导的制度变革效应仍然存在，经济增长与规模扩张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发生了质的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渐占主导地位。2003 年中国的市场化指数已近 74%，中国市场经济程度不但已经大大超过了市场经济临界水平（60%），已经从总体上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随着中国溶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度与广度在不断增强，特别是在贸易环境公平性领域表现尤其突出，各类经济成分越来越在公平原则下进行竞争和发展，非国有经济对 GDP 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69%，90%以上的产品价格完全由市场来确定，关税税率已经降到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以下，对外经济政策法规与国际规则基本一致。与市场化进程相一致，各项改革也逐步推进。与发达国家相比，改革与制度转换所创造出的巨大增长效应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重大组成部分。

我国经济既有的巨大的人口和地域空间，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促进市场规模空前扩大。随着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在经济中存在着一种所谓的“斯密效应”，即市场规模扩大带来分工与专业化，以及进一步生产率提高。因此，在我们从表面上所看到的我国

经济持续增长得益于投资、出口为代表的需求的不断扩大外，实际上生产率的规模递增效应成为重要的潜在因素。伴随巨大规模扩张所带来整体经济的效率提高，收益递增效应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因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进一步的固定资产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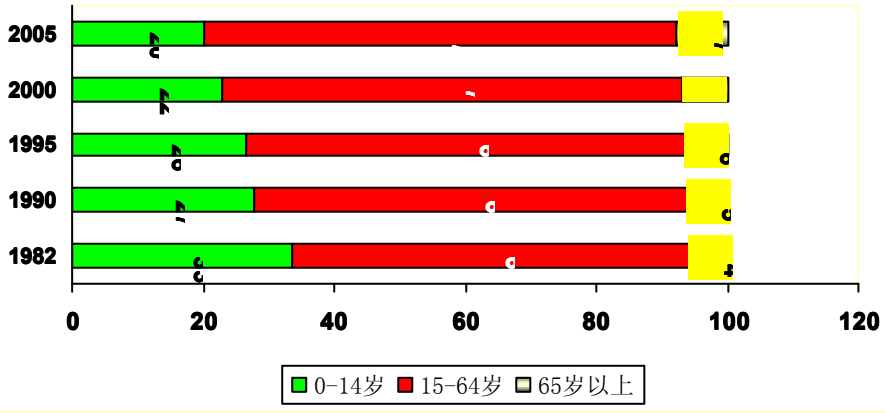
中国农村消费水平低下除了农民收入水平低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农村，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现代化的消费必须要有现代化的设施，基础设施缺乏是限制农村消费主要因素。2006 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计划，据估计 15 年内约需 2 万亿投资，年均 2700 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投资内容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计划的实施不仅在物质上改变农村的基础设施，同时也会带来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还可以维持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的惯性，吸收近年来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

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相当长时期内得以继续保持

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 15 岁－64 岁劳动力人口为 8.8 亿，占总人口的 70.15%。中国目前的人口数量及其年龄分布使中国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可以享受到“人口红利”，也就是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图 2 表明，中国实行了近 30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善了中国目前人口的年龄结构，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人口结构更富有生产性，足以保证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的充足供给,。

图2 中国分年龄人口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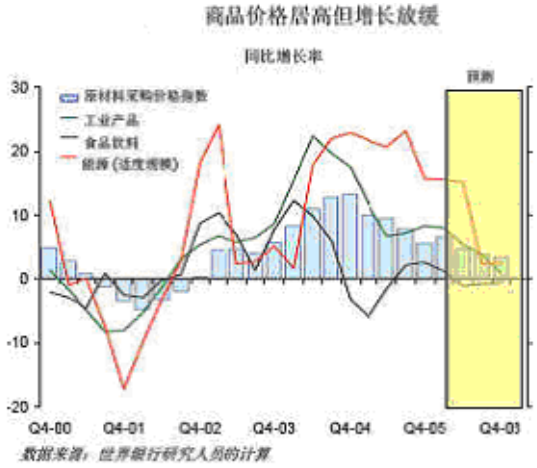
国际环境在一定时期内将维持相对稳定

根据世行经济发展展望小组的估计，世界经济前景总体依然向好，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更加均衡，作为中国最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经济放缓迹象更加明显，欧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增长，日本经济则保持着平稳增长，这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对中国出口前景具有重要意义。自 2004 年以来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按实际价格计算，已达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以来的最高价，但世界经济增长依然回升。2006 年 8 月以来，石油以及非石油商品价格总体变动率趋于减弱，国际市场面临的总体价格压力不算太大，未来可能出现缓解。

图 3、世界经济环境依然有利

	2004	2005	2006 上半
（除特别说明外均为增长率，%）			
世界 GDP(按市场汇率)	4.1	3.6	3.
高收入国家	3.3	2.8	3.
发展中国家	7.1	6.4	6.
世界贸易总额	12	9	1
7 国集团消费品价格指数	1.7	2.2	2.
非石油商品价格(美元)	17	13	
石油价格(美元/桶)	38	53	6
6 个月美元利率(%)	1.7	3.6	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展望小组(2006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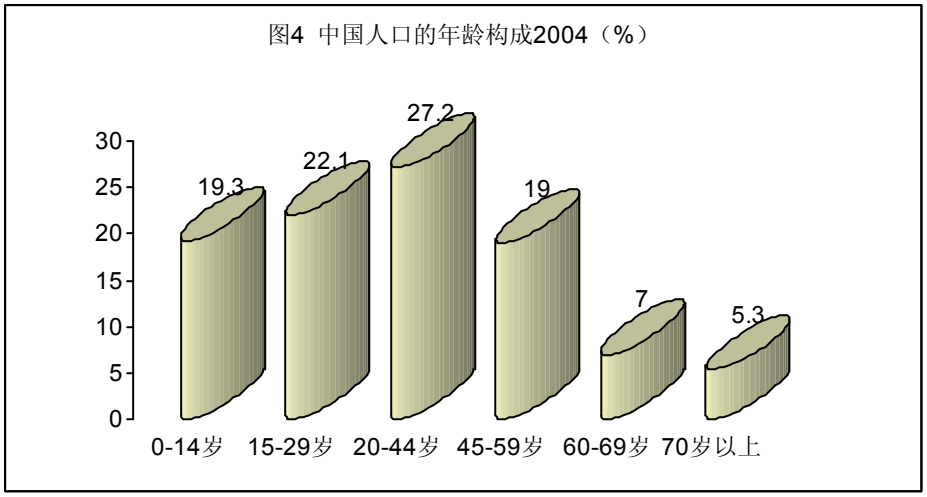


2、粗放型经济增长在长期内难以为继，可能陷入粗放型增长陷阱

中国现有经济条件决定中期内粗放型经济增长仍可持续，但从长期来看，现有模式的负面效应也会逐步加剧，并制约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如果任其持续下去，极有可能形成粗放型经济增长陷阱。

中国人口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低劳动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

根据中国人口学者的预测，随着中国总人口在 2033 年达到 14.29 亿之前继续增加，抚养比首先将进一步下降，从 2000 年的 42.6%下降到 2015 年的 39.4%，下降 3.2 个百分点，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 2015 年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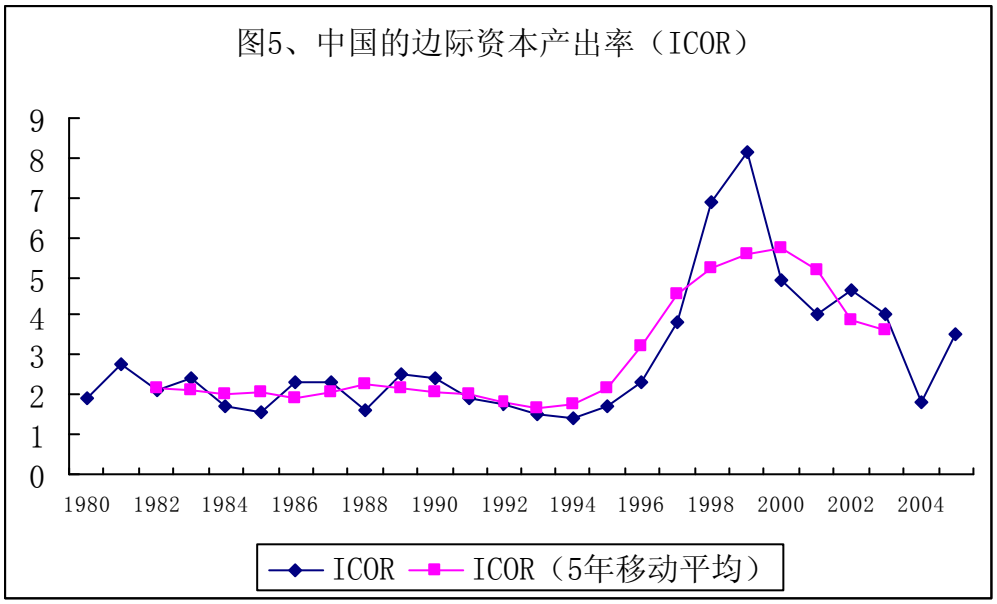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5》

图 4 中国 2004 年人口的年龄构成说明，44 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较大，老年抚养比上升的间隔将很短，15 年后将出现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的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 2017 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10%。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如何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否则，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续性。

边际投资效率不断下降

“十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快速提高在促成生产能力高速增加的同时，投资效率则呈下降趋势。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由 1997 年以前的 2-3 倍，提高到 1997 年以后的 5-7 倍，如图 4 所示。未来进一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 GDP 增长显然是很有限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2006》。ICOR=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 的增量，即“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倒数，ICOR 越大，投资效率越低。

资源与环境紧张形成长期制约

2004 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5118 亿元，占 GDP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 2862.8 亿元,占总成本的 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 2198.0 亿元,占总成本的 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 57.4 亿元,占总成本的 1.2%。由于技术问题，这些环境污染仅仅是统计了其中的一部分。

从能源方面看，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弹性系数逐年攀升，特别是 2000 年后，能源生产弹性系数急剧上升，2001 和 2002 年上升到 1.73，2003 和 2004 年也在 1.6 以上，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长期来维持在 0.5 左右或以下，但到 2002 年一跃上升到 1.19，2003 与 2004 年更是达到或超过 1.6。利用投入产出分解方法测算了 1997 与 2002 年间能源消耗增加过程中，生产技术、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因素的不同影响：在能源消耗增加量中最终消费总量、投资总量和出口总量扩张所带来的影响分别占 32%、26%和 20%，能源消耗增加的主要是总量扩张所带来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上述三项最终需求结构所带来的影响加起来只占不到 5%；生产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占 17%。我国目前的能源消耗的增长主要是经济规模扩张所带来的，投入产出数据中生产技术的变化也带来了能耗一定程度的上升。

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尽管对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代表性指标——基尼系数存在着不同的计算方法，但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却是

大家不争的事实。

表 2、基尼系数与收入差距

年份	基尼系数（%）	城镇	农村	城乡收入差距
1978			28.85	2.6
1981		16.68	25.13	2.2
1985	22.369	16.65	29.94	1.9
1991	34.109	17.03	32.47	2.4
1995	28.971	21.14	33.94	2.7
2000	39.028	25.28	33.02	2.8
2003	44.909	32.93	33.44	3.2

资料来源：基尼系数来自于 WIID（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2005），收入差距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为城镇与乡村平均收入之比。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自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和生产过程本身。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经济结构正处于急剧变化，同时由于竞争的不充分，带来失业和城乡、地区差距的拉大，不仅使社会问题更趋复杂和尖锐，而且也很难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

尽管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依然是有利的，但从长期来看，也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可能存在的风险，尤其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无序调整。“世界经济失衡”是指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存在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而中国和石油生产国则拥有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因此，美国经济下滑的速度可能超出预期和石油价格可能继续走高，对我国未来 15 年内的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严重影响。

总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从根本上得益于改革开放进程，市场化逐步推进带来经济规模空前巨大的扩张，并焕发前所未有的活力。因此，在规模本身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还没有完全耗尽的情况下，这种以争夺规模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不会有根本的转变，产业深化和技术创新就难以真正确立其主导地位，它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在于没有产业的兴盛会阻碍中间阶层的形成，进一步制约人才资源素质的提高，使收入、消费等表现出巨大的结构差异，而这些又反过来进一步制约产业的发展。在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模式和国际分工体系下，我们的增长过程就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条件，我们所能发展的程度和发展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国外资本的制约，当国内外资本都在从增长过程的简单复制中获的巨大利润的时候，也同时正在耗竭这一可以为中国未来长远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的增长资源。

三、自主创新、模式转变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1、以自主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打破低素质规模扩张的长期增长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成就显然得益于出口与投资需求持续扩张的拉动，以及市场化进程本身所带来的效率改善，同时配合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和大量廉价劳动，带来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但是，这种粗放型经济扩张模式会受到包括来自内在因素的报酬递减、外在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最终陷于难以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保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必须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模式转变的核心问题在于技术的转变，一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也是最终由外生给定的技术进步模式转变为内源性的技术进步模式的过程。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所面临的挑战正在于缺乏技术的自主创新下，利润率外生化，以及被现阶段规模扩张效应所掩盖的相对低利润水平，利用大量过剩且低素质劳动力带来的工资率外生化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这些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停留在单纯技术引进和低素质劳动基础上的规模扩张经济，从而处于一种累积性的因果联系中，而打破这种累积性因果联系的突破口正在于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同时，模式转变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所有的因素都是在相互联系与配合中发生作用，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过程中，注重将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相结合，在保持经济短期内平稳增长的条件下，积极推进长期的模式转变。

2、在集成创新模式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已有的分析表明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进程逐步加深的过程中，但这一进程是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实现。一般认为，发达国家产业经历了基于劳动密集型技术的“赫克歇尔—俄林产业”，以钢铁、造船、石化和合成纤维为代表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重化工业前期的“无差别的斯密产业”，以汽车、电器和电子产品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生产重化工业后期的“有差别的斯密产业”，以及在经历了重化工业之后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正处于以新材料、微芯片和光电子等创新为基础，发展起以集成创新为核心的新模式，即所谓的“熊彼特产业”阶段。

集成创新模式是从消费者需求开始，贯通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供应、生产、批发、销售直到最终把产品送到最终消费者的各项业务活动，实现了制造流程、实物流程、信息流程和资金流程的有机集合。为了实现大规模生产和持续创新的有机结合，必须实现

核心技术与外围技术、核心部件和外围通用部件的研发和生产相分离，伴随“集成创新模式”的兴起，产生了新的国际分工，我国现有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未来发展都与这一进程密不可分。

从历史比较的眼光来看，在世界上先后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都是在引进、模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生产模式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特殊的资源和市场环境，进行自主创新的结果。在现有发达国家集成创新模式下，对于中国进一步工业化进程来说，关键是要在我国大量简单加工装配的企业中，实行以现有资源和市场环境为基础的自主创新，尽可能积累我国的技术能力，拉长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在自主创新中，必须根据中国市场经济的要求将各种资源以恰当的形式组织起来，依托国内农村市场标准化需求和城市市场的差异化需求，通过“干中学”和企业之间的分工，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3、长期政策立足于培育国家未来经济长期发展能力

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使技术引进和本国技术积累的相互补充，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如何控制这种互补进程，才能让它促进而不是损害本国能力的发展。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过于开放，一味地引进技术，它可能就不愿意发展自己的能力。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过于闭塞，不愿引进技术，就可能因为缺乏获得互补技术而就不能在发展受限制的技术能力上有所成就，而这是以后更深能力发展的基础。那些参与战略决策过程的政府机构、研究机构或企业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其中所涉及的技术挑战和创新过程中对这些挑战做出相应反应的自主能力。

实际上，依赖于市场在技术引进过程中通过技术外溢只能解决一些非核心技术，对于核心技术在现有的国际分工体制下，可能无法通过市场演进的方式而获得，这可能只有通过国家的力量才能实现。对于我国而言，在强调市场的同时，不要丢掉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要强调在关键技术和重大技术上以政府力量的投入和组织实施，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把发展核心和重大技术看作是如同建设公路、铁路和通信一样的基础设施，并坚持设施过程中的公开和透明。

围绕技术进步的开展，在人才培养和教育体制上，现有的教育过度市场化也需要加以调整。教育的无偿投入是再分配和保证社会公平和活力的重要手段，让国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只会带来收益而无需计较成本，因为国家的强大最终是人的素质的强大，是真正的藏富于民。积极推行包括全面的义务教育、劳动保障和国民健康保险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专利权的保护、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的无偿科研投入等，使整个社会形成一

个长期稳定的预期，提高人才素质和扩大需求，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促进模式转变的政策上，为突破发展困境需要将模式转变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来加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关系、技术选择和相对价格的决定等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以一种相互联系而系统的方式得以确定，并经历着模式转变。这也正应对了当前政策上向更为平衡的收入分配的转变，也只有这种路径才更符合和谐社会的宗旨和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 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2、《中国统计摘要 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3、《中国人口统计 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

4、《中国进出口统计 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

5、《2005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中国商务出版社。

6、《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2005》，商务部。

7、《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局。

8、林毅夫，《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9、谢伏瞻，《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要点》，《中国经济报告》，2006 年第 7 期。

10、《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极速耗尽 经济增长的源泉失去》，《中华工商时报》，2006 年 9 月 25 日。

11、罗伯特·福格尔，《为什么中国有可能实现其增长目标》，《比较》，No.25, 中信出版社。

12、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6 年 8 月。

13、Edwin Lim, Michael Spence, and Ricardo Hausmann, China and Global Economy:Medium-terms Issues snd Options, Dec.2005.

14、Ross Garnaut，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ANUE Press and Asia Pacific Press, 2006.

15、Carsten A. Holz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78-2025: What We Know Today abou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morrow，working paper,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2005.

报告五：

政府经济职能的缺陷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社会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但我国的收入再分配明显效果不佳。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政府管制失灵造成的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扩大，抵消了收入再分配的效果；二是居民收入的不规范化，导致政府收入再分配职能的失灵，再分配的负担主要落在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身上。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首先必须对现行

政府资源配置职能进行改革：第一，消除政府在行使资源配置职能时的城市偏好，实现资源配置上的平等化；第二，改革现行有关制度，允许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其次，在我国收入非规范化严重的前提下，贸然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将损害中等收入阶层利益，缩小中等收入者的数量和比重，因此在收入再分配的同时，必须加大收入规范化的力度。

一、我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全社会总的居民收入差距来看，迄今为止我国政府统计部门尚未公布过全国的基尼系数数据。但从国内外学术界对基尼系数的估算结果来看，几乎所有的数据都表明收入差距正在急剧扩大。根据李实和岳希明的研究成果，2002 年我国的全国基尼系数达到 0.454[i]，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 0.49 以上。即便是按 0.454 来计算，我国现在的全国基尼系数也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从绝对数字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惊人的。2005 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902 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 2450 元，二者货币收入比为 3.23:1[ii]。如果再考虑城镇居民事实上存在的隐性收入因素，目前普遍认为城乡收入差距至少在 5:1，这个数字几乎居世界首位[iii]。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扩张。2005 年，全国城镇内部居民家庭按五等分的最高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差距接近 6 倍，其中江苏等省超过了 10 倍[iv]。可见，我国居民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不但在加速扩大，而且其累积效果已经达到了高度不平等的水平。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人均 GDP 达到 1000－3000 美元的时期，是一个经济起飞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经济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一些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及地区在 1970 年代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之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目前香港和新加坡人均 GDP 都超过了 2 万美元，台湾和韩国均超过了 1 万美元；而拉美一些国家却出现了经济衰退，如巴西、阿根廷至今人均 GDP 仍不足 3000 美元。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此阶段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和较小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保持在 0.4 以下；而一些拉美国家的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悬殊，基尼系数高达 0.6 左右，是全世界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其结果是，由于缺少促成社会稳定的庞大中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使社会民主化和社会改革难以进行，导致社会腐败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并处于长期动荡状态，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绝不能忽视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问题。2005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1700 美元，正好处于上述拉美和东亚在 1970 年代所处的敏感时期。因此，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我国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不佳

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国家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常规方法。从理论上说，这可以解释为市场机制本身具有按要素分配的功能，而由于各阶层公民的生产要素占有量（或要素禀赋）有差别，因此在按要素分配的条件下，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存在；同时，由于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相比，更具有积累效应，即资本积累带来的收入增长大大高于劳动积累带来的收入增长；技术要素与劳动要素相

比，也由于“干中学”和专利制度等原因而具有边际收益更高的特性，因此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不断扩大。这实际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而收入再分配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措施。这也是西方国家在类似情况下的常规政策选择，但我国的情况可能没那么简单。

我们注意到，我国政府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支出一直在不断提高。1995－2004 年，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从 115 亿元增至 600 亿元，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由 1.7%增加到 2%以上[v]。1995－2002 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由 2465 亿元增至 7318 亿元，在 GDP 中的比重由 4.19%增加到 7.15%[vi]。2005 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已占中央财政总预算支出的 57.1%，其中大部分投向了人均收入低的中西部地区[vii]。但奇怪的是，我国收入再分配力度虽一再加大，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却连减缓的迹象都没有，这与西方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英国为例，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在1994/95 年度，英国全部家庭按收入五等分的最高 20%家庭与最低 20%家庭，二者收入差距最初为 19.8 倍（以下层为 1），但在经过税收和福利政策调整之后，二者最终收入差距下降到 3.7 倍。再以美国为例，仅累进所得税一项，就使最低收入者与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大大缩小。在美国统计的“单身者”、“户主”、“已婚联合申报”、“已婚分别申报”四种纳税主体中，税前的最高、最低收入比分别为 11.0、8.2、6.6、6.6 倍，税后的最高、最低收入比分别下降到 7.8、5.8、4.7、4.7 倍[viii]。可见，我国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效果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因此，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有可能还存在某些收入再分配政策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认为，这个深层次原因很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管制失灵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抵消了政府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二是居民收入的不规范化，导致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失灵，收入再分配的负担主要落在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身上，使收入再分配缺乏“损有余以补不足”的效果。

在本文的以下部分，将主要论证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管制是如何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二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具备的功能，即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的功能，为什么在我国难以发挥。

三、政府管制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与收入再分配一样，都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因而适当的政府管制是必要的。但如果政府管制导致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即不适当地干预了本应由市场机制来决定的资源配置，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某些负面效果，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是其中之一。政府管制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机制，可以从经典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ix]。按照该理论，地区、部门之间的人均收入增长之所以不同，是由于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不同。如果地区、部门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限制，则劳动力将从资本稀缺、收入低的地区、部门迁居至资本密集的地区、部门，而资本密集地区（部门）的资本将转移至资本稀缺的地区（部门）。市场机制促使这两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最终将使地区（部门）间的资本－劳动比率趋同，因此地区或部门间的人均收入也会趋同，这就是所谓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但这个效应的发挥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如政府既不能阻止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不能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代替市场机制在地区（部门）间配置资源。如果政府管制违反了上述前提条件，那么显然会阻碍人均收入的趋同；不仅如此，如果生产要素因政府管制而不能自由流动，则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各地区（部门）的初始资本数量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从而促使资本－劳动比率的差距扩大，人均收入差距将因此而扩大；而假如政府在利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时人为地向资本密集的地区（部门）倾斜，则人均收入差距会因此加速扩大。可见，市场机

制虽然由于按要素分配而扩大了各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但它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动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即“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而政府管制却阻碍了这一效应的发挥。所以，政府管制的失当确实有可能扩大收入差距，而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政府管制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同样可以由上述索洛－斯旺模型来解释。从现实情况看，政府管制不但在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两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在行使资源配置职能时偏向人均收入高的城市部门。这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这首先表现为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城市偏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向重工业倾斜，财富向城市集中，对农村抽取过多、补给过少。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政府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城市偏好并没有改变。比如从财政支出来看， 1978 年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来也没有高于 15％，大部分年份低于 10％，2005 年这个数字是 7％；这是远远低于农业在 GDP 中的比例的，“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分别为 31.4%、26.2%、20.9%和 18.3%，2005 年这个数字是 15％。另有研究发现，农村地区上缴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 26％，但只得到了 9％的政府拨款[x]。再如从金融资源的分配来看， 2004 年农业贷款仅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的 5.3％[xi]，还低于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上述差距是可以从统计年鉴上看出来的有形差距，而政府许多偏向城市的具体政策，也在无形中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教育为例，国家要求实行全民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城市中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负担，农村中的义务教育经费却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城市学生的教育经费大约是农村学生的 4 倍，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因此而不到 50％，与城市已普及高中教育形成巨大差距[xii]。在市场经济中，教育程度高就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和机会，许多学者的实证分析已经表明，教育收益率的提高，从而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xiii]。农村在教育政策方面的劣势，无疑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再以各种政策性补贴为例，这虽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但改革以来它们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1978－2001 年的价格补贴总额累计高达 8714 亿元，亏损企业补贴总额累计达 6435 亿元，以上两项合计使城市居民获得了 15149 亿元的收入；而同期国家财政累计用于农业的支出为 9512 亿元，如果从财政口安排的资金来计算（即不包括剪刀差），则占总人口 2/3 的农民从政府所得仅相当于城市居民上述两项收入的 63％[xiv]。

其次，政府管制还表现为政府对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劳动力从资本稀缺、收入低的地区、部门迁居至资本密集的地区、部门，本来是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人均收入趋同的重要途径。但目前这种要素流动是受到严重阻碍的。现行的户籍制度虽已不能禁止农民进城打工，但各级政府仍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农民迁入城市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如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农民离开农村要办五证（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待业证、毕业证），要缴纳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和公粮水费。农民进城后还要办暂住证、健康证、收取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企业要收取保证金，将这些证办完、费交齐，少则数百元，多者数千元。另一方面政府明确规定诸多岗位不允许雇佣外地劳动力；或以“再就业工程”名义，通过奖罚手段诱导企业用本地失业工人替代农民工。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还是出于城市偏好，即为了防止农民与城市就业者争夺就业岗位。这种做法严重地扭曲了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剥夺了农民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不仅如此，城市偏好还间接地阻碍了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与城市资本的结合。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城市里

的工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旺盛，为人均收入的趋同提供了基础。我国目前也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但是由于上述政府的城市偏好政策，造成了农村的贫困落后，大大缩减了农民的购买力，使农村市场狭小、农民的劳动力素质下降。结果一方面造成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工业品的有效需求不足，抑制了城市工业的增长速度和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进城农民工难以符合城市工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难以发挥，人均收入趋同也失去了必要条件。这就是说，政府管制所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效果，不仅直接阻碍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而且间接阻碍了城市资本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抑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

四、政府管制与我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城市内部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扩大，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有城市户籍的各阶层收入差距，二是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与无城市户籍的进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这两个方面，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都有一定的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种作用产生的机制，与城乡收入差距类似，也是通过资源配置不平衡、阻碍要素自由流动来实现的。

首先来看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工之间的差距。这可能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看发展经济学的说法，美国学者托达罗指出[xv]，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内部存在两部门现象，一是城市中的现代部门（或正规部门），二是城市中的传统部门（或非正规部门）。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受到工会力量或政府政策影响，因而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同时，正规部门的工人还享有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以及劳动安全保障、社会保险等。而非正规部门的从业者没有上述待遇，其就业身份、地位只是临时性的。当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流入城市时，如果不能在正规部门中找到工作，就很可能先在非正规部门打零工，以便等待以后找机会进入正规部门工作。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我国进城农民工大部分都就业于非正规部门，以安徽省为例，该省外出打工者有 78.3%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这些打工者不但不享有劳动安全保障和社会保险，而且平均每周工作 6.4 天，每天工作 10.5 小时，93%居住在简易住宅、工棚或居无定所[xvi]。显然，这些都与我国政府明文规定的劳动政策有很大差距，呈现明显的非正规部门特点。

尽管城市非正规部门待遇较低，但由于中国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较低，农民工即使是在城市打零工，其收入也要大大高于务农收入。据统计，农民外出打工收入是务农的 4 倍[xvii]。而对于城市正规部门来说，由于对从业者技术、学历、户籍、社会资本等方面的较高要求，大多数农民是很难进入的。具体说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技术、学历等人力资本因素，即城市正规部门需要的劳动力是拥有一定人力资本的技术性劳动力，农民工因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难以符合正规部门的要求。二是户籍、社会资本等制度性因素，即地方性城市政府为了维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制定了一系列排斥和歧视农民工就业的政策，如通过各种收费渠道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明确规定诸多岗位不允许雇佣农民工，通过奖罚手段诱导企业用城市失业工人替代农民工等[xviii]。因此，我国城市内部实际上形成了二元的劳动力市场，进城农民工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这样，我国的城市化就主要体现为农民从农村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流动，城市化进程不仅表现为城市化率的提高，而且表现为城市中非正规部门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1982 年，我国城市人口中的 14.6%，约 3146 万人没有“农转非”；而到 2003 年，没有“农转非”的城市人口已达 14699 万，占当年城市人口的 28%。这说明，那些没有“农

转非”的进城农民对我国城市化贡献巨大。这个特点将对我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笔者曾利用 1978－2003 年的数据，对我国城市化与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做过一项计量研究[xix]，得出的计量方程结果如下：

$$ID = 0.211 + 0.988 \cdot URBAN + 0.982 \cdot HUMAN + 0.387 \cdot SECU - 0.026\,T \qquad (1)$$

(0.473) (5.458) (5.929) (2.438) (-0.67)

R^2＝0.963 DW＝1.382 F＝136.554

其中 ID 是代表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变量，URBAN 代表城市化水平，HUMAN 用来度量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人力资本差距（用教育经费占 GDP 之比衡量），SECU 是代表政府对城市正规部门政策倾斜的变量（用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衡量），T 是时间虚拟变量，代表模型中其他变量无法解释的因素。括号内的值为 t 检验值。从（1）式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URBAN、HUMAN、SECU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值，这说明城市化虽然可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xx]，但它同时正在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将问题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既有农民工劳动力素质低的原因，也有政府管制部门偏向城市正规部门的原因。而这两个原因都体现了政府在资源配置对有户籍城市居民的倾斜政策，道理很简单，目前教育经费和社会保障的享受者主要是有户籍的城市居民，农民工所在的城市非正规部门是难以享受这些待遇的。而根据（1）式，这种资源配置上的倾向性将会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同时，农民工由于制度性因素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因此劳动力要素实际上又无法自由流动，这就在体制上排除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流动而缩小的可能性。

其次来看有城市户籍的各阶层收入差距。按照托达罗的理论和中国的现实，他们都应该属于城市正规部门，都享有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政策优惠。但即使是有户籍的城市居民，其享有的优惠待遇也是不平等的。赵人伟、李实和卡尔·李思勤的合作研究表明，1995 年城镇居民得到的各种补贴和转移收入所产生的不平等，占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 43.1%[xxi]。这种情况近年来并没有多少缓解，截止 2003 年底，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职工人数还不到城市从业人员总数的一半。大量的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没有享受正规部门的社会福利，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有 440 万人，仅占城市登记失业人员总数的 57%[xxii]。城市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总是与学历、单位等因素挂钩，教育程度高者、工作在国有企业或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者可以享受较好的社会保障；而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如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等，享受的社会保障数量少、享受的概率低；个体工商户作为一个自我雇佣的阶层，很多也无法纳入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即越是待遇好、工作稳定的单位职工，越能享受到社会保障；越是待遇差、失业风险大的单位职工，越没有机会享受社会保障，这就形成了社会保障的“逆向调节”。 由于缺乏分阶层的社会保障数据，目前还无法对城市社会保障与城市内部正规部门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类似英美那样的计算，但社会学家的一项成果已经足以证明“逆向调节”的存在。赵卫华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2001 年在深圳的问卷调查数据，用回归分析检验了社会保障与居民耐用品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不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干部、企业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这 5 个脑力劳动阶层与个体工

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这三个体力劳动阶层在耐用品消费上存在明显的差距，但是当控制了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差别之后，各脑力劳动阶层和体力劳动阶层之间的耐用品消费差距大幅度缩小了[xxiii]。这说明，社会保障在城市正规部门内部各阶层间的分布差距，确实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个结论还可以从居民主观感受的数据中得到证实。陆学艺 2001 年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调查”中，有这样一项数据，当居民被问道“您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谁最容易获得高收入”时，有 50.6%的人回答是“当官”的人，有 28.8%的人回答是“有文化有学历”的人，二者合计达 79.4%[xxiv]。而这两种人正好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城市正规部门中受政府政策倾斜的群体。该项调查从居民主观感受方面印证了我们的结论。

五、居民收入的不规范化与政府收入再分配职能的低效率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如果政府收入再分配职能很有效率，则必将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而缓解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但是，这种在西方国家很有效的方式未必适合于我国，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收入存在严重的非规范化问题，这将导致严重的收入再分配低效率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缺陷的问题。

我们可以以城市居民的收入再分配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政府要进行收入再分配，首先必须清楚各阶层居民的收入，以此分辨谁是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然后才能决定收入再分配的负担者和受益者应该是谁。但实际上政府远不能做到这一点，国民收入分配的相当一部分一直处于政府监控之外，成为不知去向的灰色收入。社会学家孙立平曾经估算过 2002 年居民灰色收入的数额。我们以 2004 年的数据对此进行估算。2004 年我国 GDP 达到 13.7 万亿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有关数据，我们可以看看这 13.7 万亿是如何分配的。它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块是企业的利润，大约 1.1 万亿；第二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 2.6 万亿；第三块是城镇居民的收入，2004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421.6 元，当年城镇人口为 5.4 亿人，则 2004 年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将近 5.1 万亿；第四块是农村居民获得的收入，2004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936.4 元，当年农村人口为 7.6 亿人，则 2004 年农村全部居民的纯收入将近 2.2 万亿。这四块加起来共 11 万亿。也就是说，还有 2.7 万亿不知分配给了谁。应当承认，上述的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当中有重复计算、误差等，但国民收入中的相当大部分处于政府的监控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以 2004 年的城市居民收入为例，在城市居民 5.1 万亿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工资总额”，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标准，“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它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在 2004 年，工资总额约 1.7 万亿。5.1 万亿去掉 1.7 万亿，还有 3.4 万亿。这 3.4 万亿包括城市中的个体职业者的收入，包括股息、利息、租金等收入。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城市居民收入中，除了工资总额部分是处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外，其余的 3.4 万亿，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处在政府的监控之外的。也就是说，收入的非规范化相当严重。

收入的高度非规范化，直接结果就是收入再分配的低效率。因为这将导致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来源——累进性税收无法实现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有效调控，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在西方国家中，人们在税前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很大，但经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这种差距会大大缩小。比如我们在前文指出，1994/95 年度，英国全部家庭按收入五等分的最高 20%家庭与最低 20%家庭，二者收入差距最初为 19.8 倍（以下层为 1），但在经过税收和福利政策调整之后，二者最终收入差距下降到 3.7 倍。但在我国，

个人收入所得税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迄今为止，国家还没有发布过税收调节前后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数据。但统计数字却已经表明，中低收入阶层所承受的个人所得税负担要高于高收入阶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城乡之间，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计算，农民的税费负担高得惊人，如果把农民以各种缴纳的“费”看作个人所得税，则获得城乡居民总收入 33%的农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将占我国全部个人所得税的 60%[xxv]。第二，在城市内部，由于收入分配是高度不规范的，个人所得税只能以相对规范的工资性收入作为征收对象，于是，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根据不同地区的调查，在城市地区，工资只占全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33%，而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却占了 45%到 70%。还有零星的数字表明，2001 年尽管人数不足 20%的富人们占有 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但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 10%[xxvi]。相比之下，美国是个人所得税制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尽管高收入者的逃税问题也很严重，但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 60%以上。很显然，如果中低收入阶层所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反而高于高收入阶层，那结果只能是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再分配实际上导致高收入者把本应承担的税收负担转嫁到了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头上。“损有余以补不足”就变成了“损中等收入阶层以补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者容易产生被剥夺感。

可见，在收入缺乏规范化的情况下，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职能是低效率的。从我国目前累进性税收的实际情况来看，真正负担这种税收的并不是高收入阶层，而是中等收入阶层。加大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只能意味着加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负担，从而减少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显然与我国“加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如果中等收入者的利益因此受损，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这甚至比低收入者的贫困更加危险，因为中等收入者普遍都是有一定学历、能力，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群体。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再分配在我国效果不佳。原因在于两点：一是政府管制失灵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抵消了政府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二是居民收入的不规范化，导致收入再分配的负担主要落在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身上，难以起到“损有余以补不足”的作用。这说明，要想在现阶段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职能。所以，本文认为，缩小收入差距不是短期就能见效的，在坚持收入再分配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做的是一些基础性工作。这些基础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在政府管制方面，现行的政府资源配置职能需要进行以下调整：

第一，消除政府在行使资源配置职能时的城市偏好，实现资源配置上的平等化。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城市偏好，从历史上看是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残余，从现实上看则有可能是政府决策失误、政府维护城市居民利益（这里可把城市居民视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但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资源配置偏好，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有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这表明，目前这种政府资源配置的城市偏好，其风险和成本已经相当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相应调整资源配置职能、放弃城市偏好。

第二，改革现行有关制度，允许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由于各种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不仅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难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功能加以矫正，而且还引发了城市内部各个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新问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就意味着，如果现在通过改革有关制度允许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则改革收益可能会相当大。因为它不仅可以通过发挥市

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功能缓解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而且大大有助于解决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利益冲突问题，从而消除了对社会稳定的最严重的威胁。

其次，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实现收入规范化，因此政府难以准确判断谁是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仅仅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有可能损害的是中等收入者的利益，难以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所以，目前不宜贸然加大收入再分配的力度，而应集中精力推进居民收入的规范化。这显然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

---

[i] 李实、岳希明：《中国个人收入分配》，天则经济研究所第 253 次双周学术讨论会讨论稿。

[ii] 顾严、杨宜勇：《2005－2006 年：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与展望》，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

[iii] 林光彬：《等级制度、市场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管理世界》2004 年第 4 期。

[iv] 顾严、杨宜勇：《2005－2006 年：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与展望》，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

[v] 《中国统计摘要（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

[vi] 蔡社文：《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分析》，财政部《预算管理会计月刊》2004 年第 7 期。

[vii] 顾严、杨宜勇：《2005－2006 年：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与展望》，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

[viii] Social Trends 27, 1997,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K; 2003 年 5 月 23 日《经济日报》。

[ix] 该模型的规范化表述参见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99 年。

[x] 安迪·罗斯曼：《外国学者看中国“三农”》，《东方》2002 年第 8 期。

[xi] 《中国统计摘要 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

[xii] 林光彬：《等级制度、市场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管理世界》2004 年第 4 期。

[xiii] 陈钊、陆铭：《教育、人力资本和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上海经济研究》2001 年第 1 期。

[xiv] 吴光炳：《城乡收入差距是如何扩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第 322 页。

[xv] Todaro, M.,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9, 1-22.

[xvi] 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人口研究》2004 年第 5 期。

[xvii] 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经济研究》2001 年第 3 期。

[xviii]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

[xix] 具体情况参见拙作：《城市化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

[xx] 持此观点的人很多，如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4 年第 4 期。

[xxi] 赵人伟、李实和卡尔·李思勤：《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第 95 页。

[xxii] 唐钧：《问题与障碍 ——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的社会政策思考》，宁波出版社，2004 年，第 118 页。

[xxiii] 赵卫华：《当代中国居民消费分化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2004 年博士论文，第 110 页。

[xxiv] 转引自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204 页。

[xxv] 孙立平：《收入分配差距是如何扩大的？》，《南方周末》2003 年 4 月 10 日。

[xxvi] 孙立平：《如何规范收入和财富分配》，《经济观察报》2006 年 7 月 24 日。

报告六：

经济增长视野下的工业化和对外贸易

1990 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服务于工业化进程的调整和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不断演变，从满足国内生产的投入需求和产出实现这两个角度，外贸成为突破工业化进程国内约束的有效手段。工业化和对外贸易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我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基本特征。

但是在我国工业化结构和贸易结构动态调整的背后，比较优势基础并没有实现动态化。从国际竞争力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我国主要的优势产业；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扩张并没有带动国内工业附加值的增加。这就说明我国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依然是基于静态的劳动成本优势之上。这种简单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在带动我国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加大。这集中表现为近年来所出现的贸易条件恶化、环境和资源压力加大、比较优势基础固化和静态化。

过高的经济增长成本威胁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调整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方向，工业的发展注重利用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成果改造传统产业，而不是简单地用重化工业替代传统工业的“重化工业化”。在整个产业结构中，要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核心的非贸易品行业。适应工业化道路的调整，外贸战略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在进口战略方面，应服务于改造国内传统产业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的需要，实现工业结构、贸易结构和比较优势三者之间的互动调整，克服工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动态变化与比较优势静态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工业结构升级构建长期可持续的基础。在出口战略方面，摆脱那种简单地适应国内现有加工业粗放扩张的模式，减少一般制成品出口的政策性优惠，实现一般制造业的有序调整和收缩；利用出口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引导国内工业部门的调整。适应于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服务业的需求，综合利用收入分配政策、汇率政策、出口政策和进口

政策等，改变国内居民的需求结构，突破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需求约束和投入约束。

一、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全方位开放战略之下得以迅速推进。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随着开放的全面深入而加速发展，1992 年至 2004 年，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 38.6%增至 45.9%。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扩张。1991 年以来，工业对 GDP 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 50%以上。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是来自工业的增长。1992 年至 2004 年，中国的 GDP 年均增长 9.8%，其中有 5.8 个百分点是来自工业的增长。

图 1 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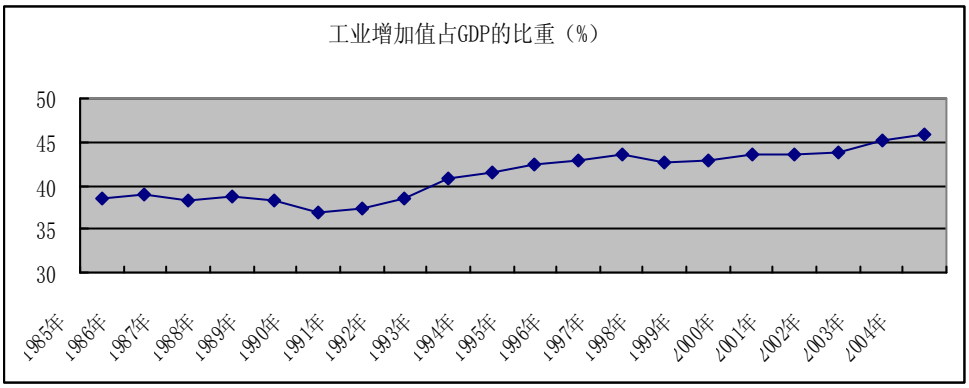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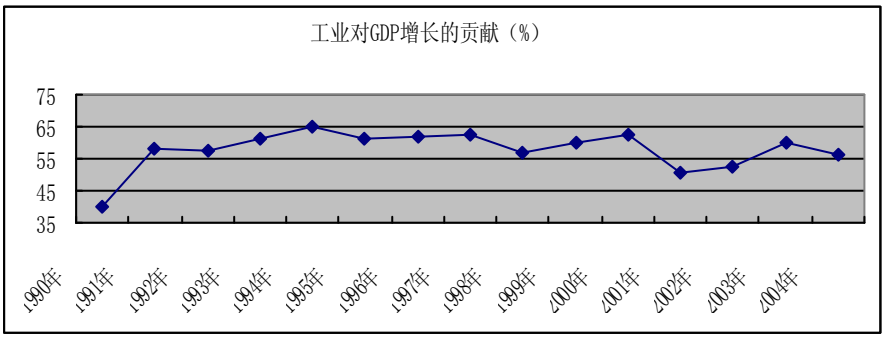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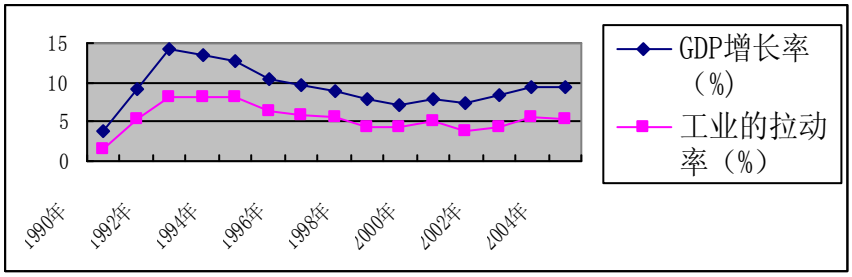


图 2 工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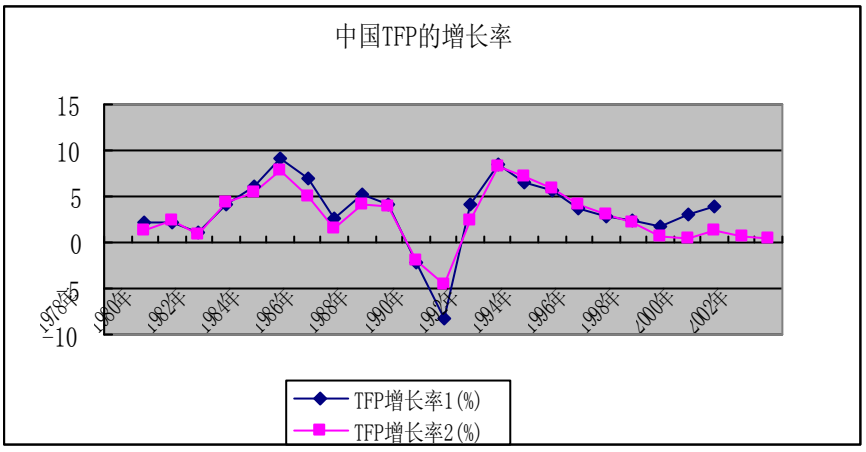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人均资本存量（K/L）的提高，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下式（于春海，2006）：

$$\ln(Y/L) = \ln(TFP) + 0.51\ln(K/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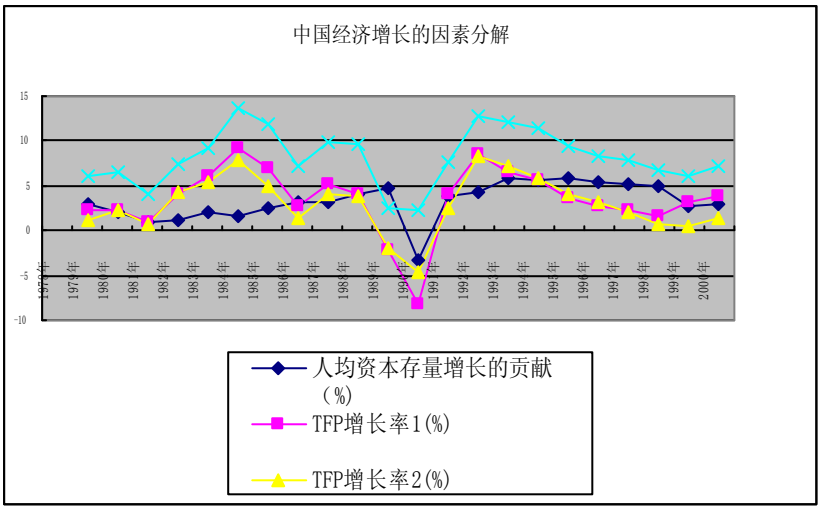
由此可以得到中国 TFP 增长率的估算数据[xxvi]：

图 3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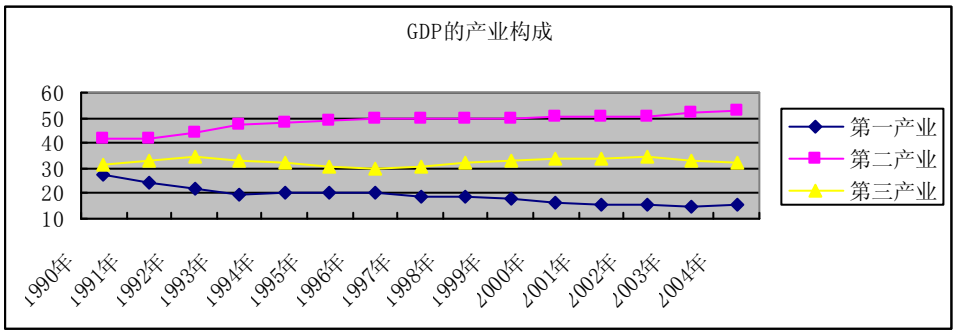
进一步结合人均 GDP 的增长率数据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动数据[xxvi]，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解[xxvi]：

图 4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由此可以看出，人均资本存量和 TFP 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相对作用是变化的。在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在 1994 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则更多的是来自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这也是目前很多人所说的“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但无论是哪种因素的变化，主要动力之一都是工业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替代，即所谓“二元经济”转型。而服务业比重的变动相对较小。在工业替代农业的过程中，一方面工业相对农业是资本密集的，GDP 构成中工业比重的增加必然导致全社会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正是通过这两个基本途径，工业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施加了显著的推动力。

图 5 中国 GDP 的产业构成



二、对外贸易是突破国内工业化约束的有效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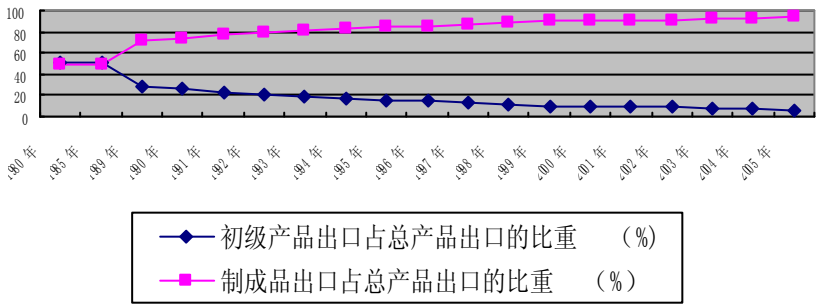
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外开放来突破工业化的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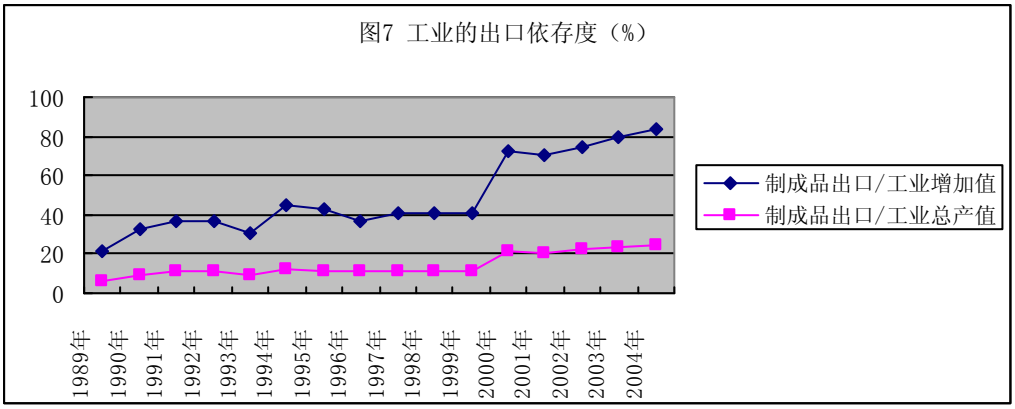
对外贸易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它配合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或者说，工业化是对外贸易撬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杠杆。由此，可以界定我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基本内涵就是：利用开放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趋势，基于劳动成本优势构建我国开放背景下的工业化模式。基于劳动成本优势这一共同的基础，构建相互关联的外贸战略和工业化模式，这充分发挥了我国的制造业比较优势，使制造业出口得到高速发展，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以及世界范围内制造业的转移趋势使得中国的工业在出口带动下迅速发展。

- **制成品出口拉动下的工业扩张**

90 年代以来，在我国 GDP 的产业构成中，工业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37%升至 2004 年的 45.9%（见图 5）。与此相适应，在我国的出口中，制成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74.4%升至 2005 年的 93.6%（见图 6）。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进一步分析工业的出口依存度，可以看出，1990 年以来制成品出口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了 50 个百分点。这在总量上反映出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对于出口的高度依赖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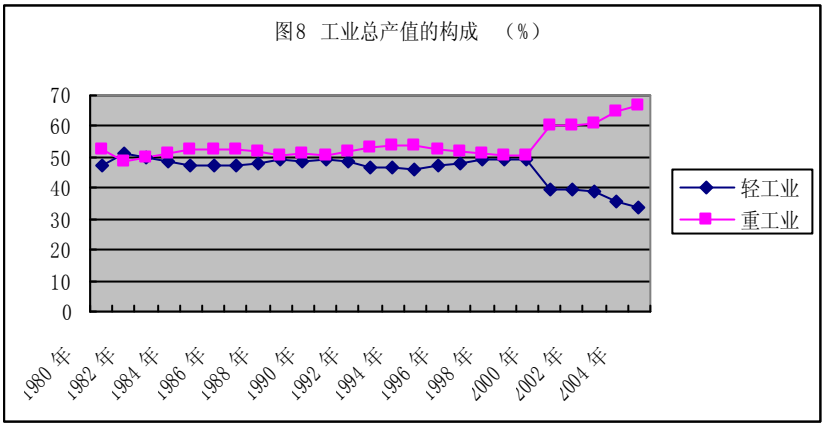
图6 出口的产品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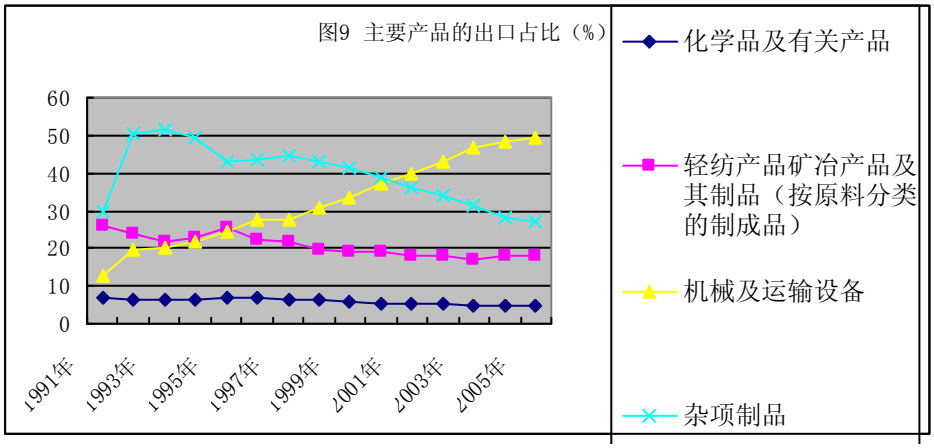




- **重化工业阶段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依赖于对外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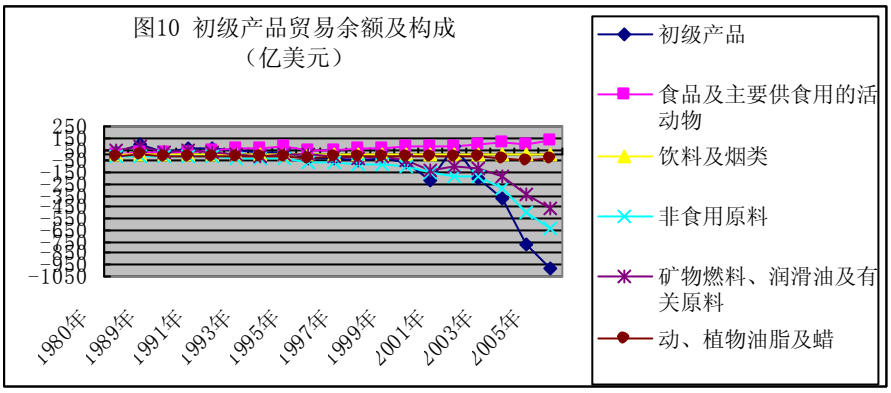
2000 年以后，在我国的工业结构中，能源、钢铁、机械、化工、汽车和有色金属等重化工业比重迅速提高。从 1999 年到 2005 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50.8%升至 66.5%（见图 8）。这反映出我国工业化进程逐步从轻工业化阶段走向重化工业阶段。对此相对应的是机械及运输设备在我国制成品出口中的占比超过杂项产品，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见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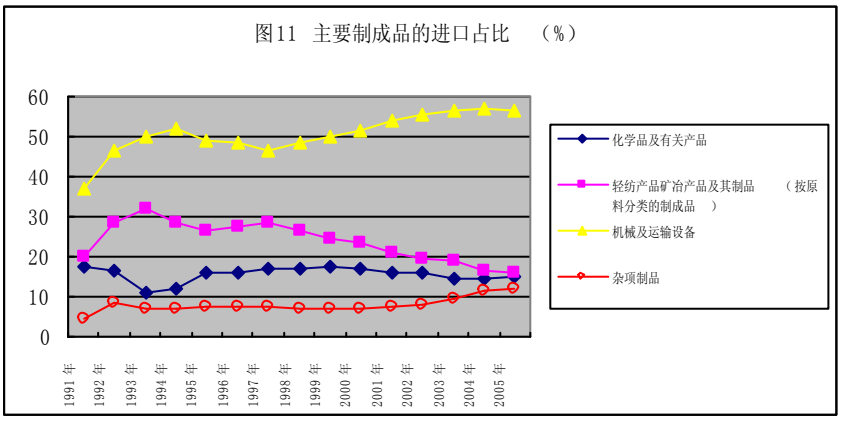


重化工业对轻工业化的替代是我国近年来工业化过程继续向前推进的基

本特征。这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可以表明，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基础发生了变化。出口的增长从市场实现的角度拉动了重化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但是从投入角度来看，由于重化工业的发展依赖能源和资源的大量投入，其次还依赖于机器设备的大量投入。而在这两个方面我国都没有优势，也就是说，重化工业的发展在国内面临投入约束。相关产品进口的增加，有助于我国突破发展重化工业面临的投入约束。2000年以来，在初级产品贸易方面，我国在非食用原料和矿物原料等产品上逆差不断增加，（见图 10）这反映出国内重化工业发展对于进口原料和资源的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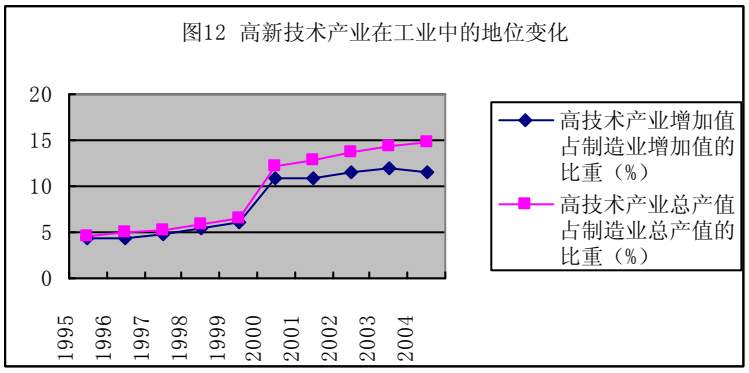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在制成品进口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进口比重显著提高，从 1997 年的 46.4%增至 2005 年的 56.7%。（见图 11）这反映出我国重化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在投入方面依赖于进口的机械和相关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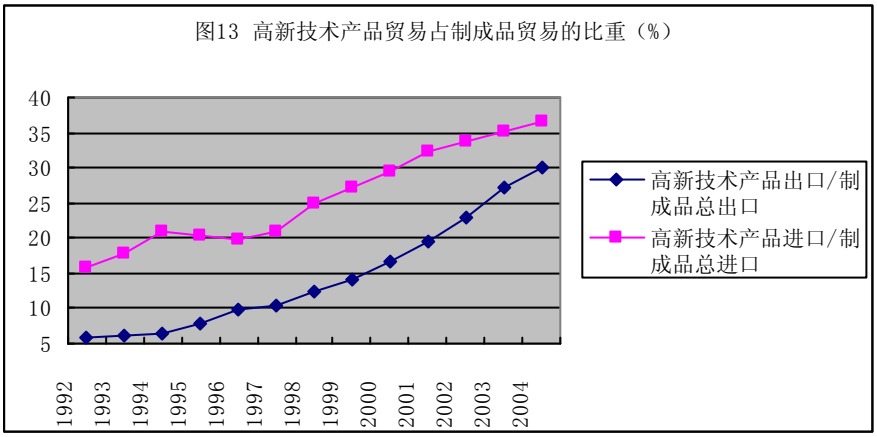
- **“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凸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过度外向性**

顺应国际分工体系变化和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建立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是我国推进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层次的另一个选择。90 年代中期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95 年至 2004 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 4.4%增至 11.6%，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4.5%增至 14.8%（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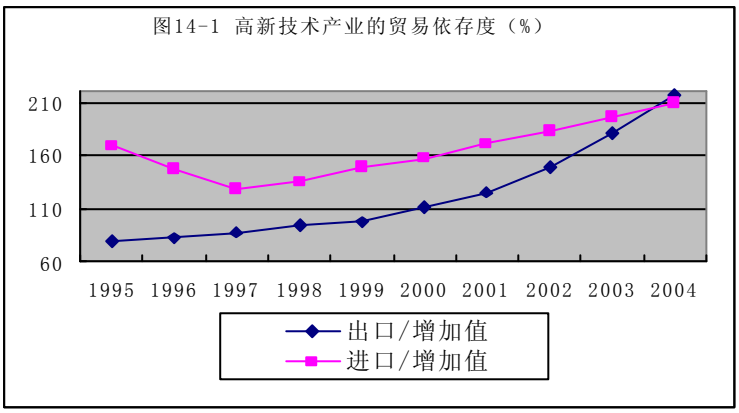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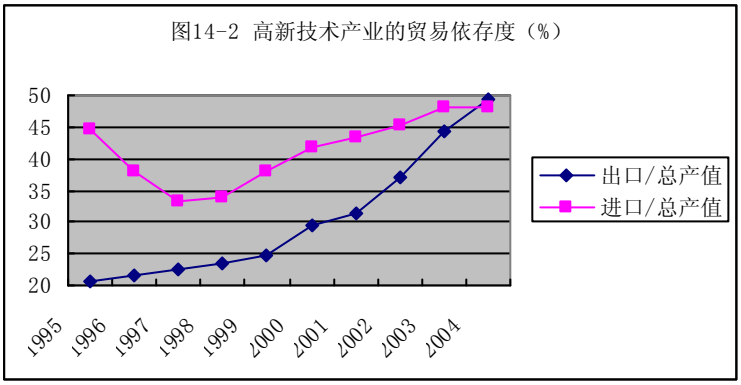
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在制成品出口方面，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从 1995 年 7.9%上升至 2004 年的 29.9%。在制成品进口方面，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占比从 1995 年 20.3%上升至 2004 年的 36.6%。（见图 13）



在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该产业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1995 年至 2004 年，出口占增加值的比重从 80%增至 215.8%，远高于同期制造业整体的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甚至更高，一直在 100%以上（见图 14）。根据总产值来衡量，出口依存度从 1995 年的 20.6%升值 2004 年的 49.3%。进口和出口依存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从建立到发展和扩张的过程。1990 年代中期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处于建立初期，其产出能力较低，必须大规模的进口高新技术产品以满足国内的需求。随着我国高新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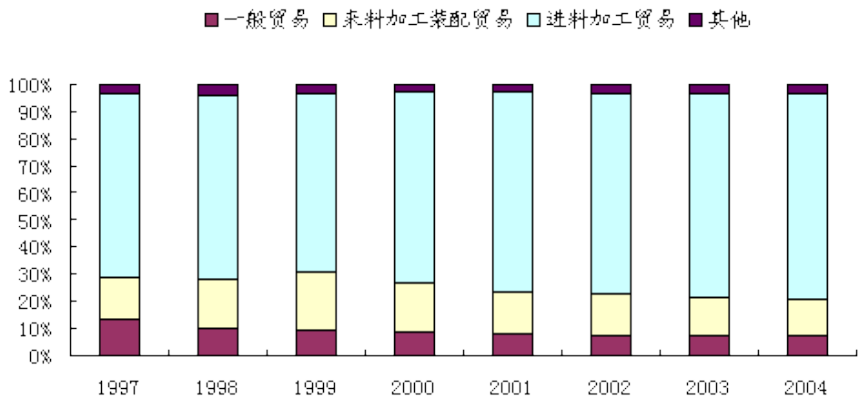
产业的发展，其产出规模不断增加，产出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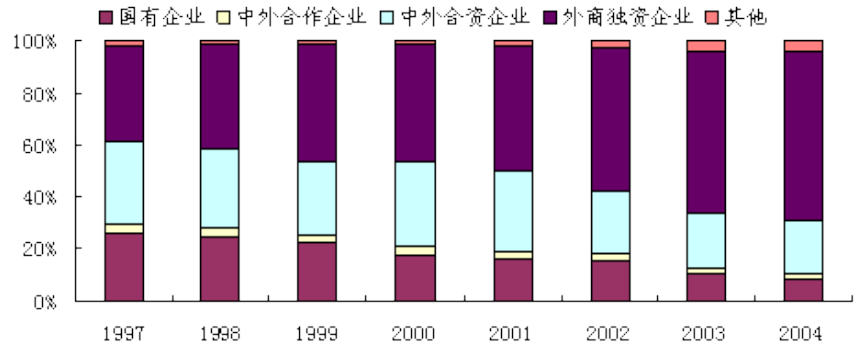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极高的进口和出口依存度，这反映了对外贸易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方式和出口企业的类型，可以发现，进料加工贸易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主要贸易方式，比重达到 70%左右；在出口的主体结构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直接面向国际市场的，通过进口相关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经过国内简单加工，然后以制成品的形式出口国际市场。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具有更大的外向性，对外贸易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远远高于其他制造业。

图 15 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方式和出口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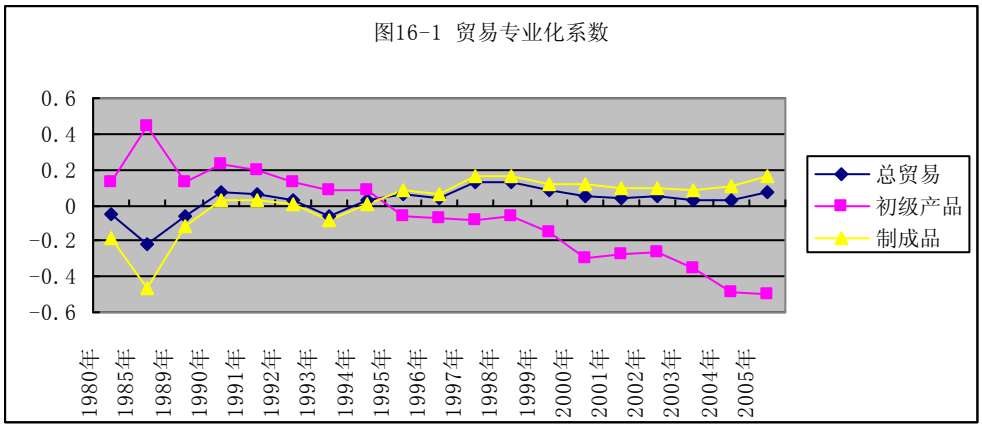
三、劳动成本优势是决定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比较优势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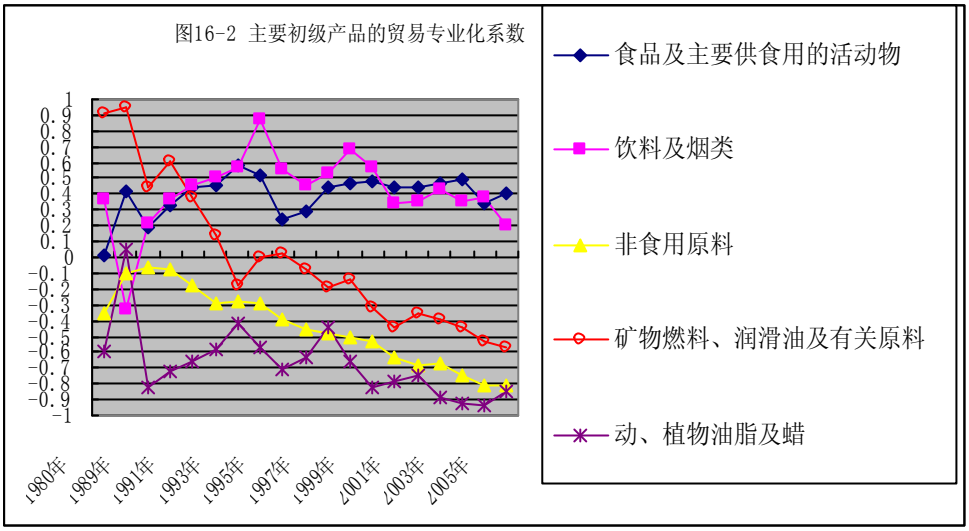
工业化与对外贸易之间互动关系，反映了我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基本内涵，即利用进口和出口突破国内工业化过程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受到的约束。在外向型战略之下，我国工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实现了动态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但是在这种变化背后，决定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定位的比较优势基础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也就是说，虽然我国的工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了动态变化和升级，但是其背后的基础即比较优势，并没有实现动态变化。

- **贸易结构的动态调整反映我国劳动成本优势的实现形式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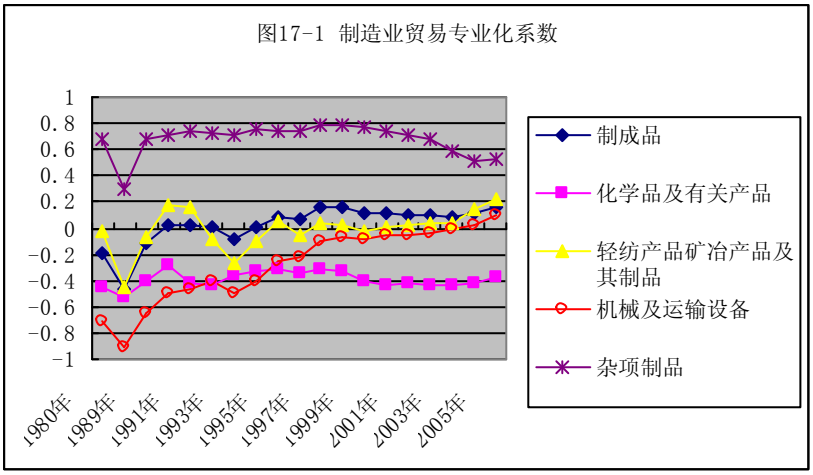
首先考察在我国不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这用贸易专业化系数[xxvi]来表示。我国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在 1997 年至 2004 年之间有所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金融危机后周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贬值对我国制成品国际竞争力的不利影响。而初级产品的贸易专业化系数在 1994 年以后一直是负值，并且不断下降。（见图 16-1）在初级产品贸易方面，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贸易专业化系数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基本都是负值，并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能源或资源性初级产品的贸易逆差是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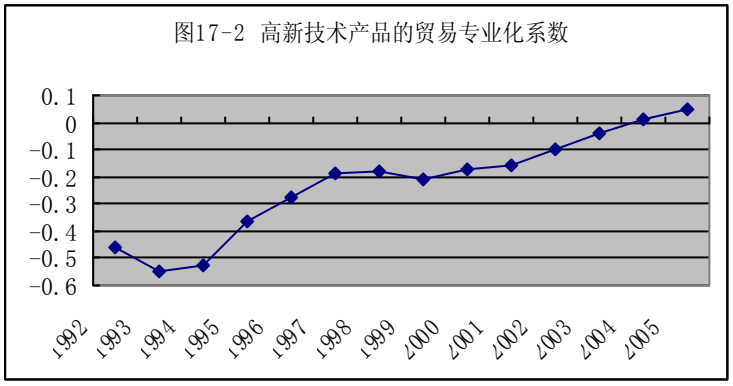
初级产品整体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见图 16-2）





在制成品贸易上，制成品整体贸易专业化系数在 1997 年以后的变化不大。但是在制成品内部，杂项产品专业化系数的下降趋势、机械及运输设备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xxvi]贸易专业化系数的上升趋势都非常明显（见图 17）。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工业结构的变化，重化工业对轻工业的替代，导致以服装、鞋帽、玩具和家具为主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贸易顺差相对下降，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以及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相对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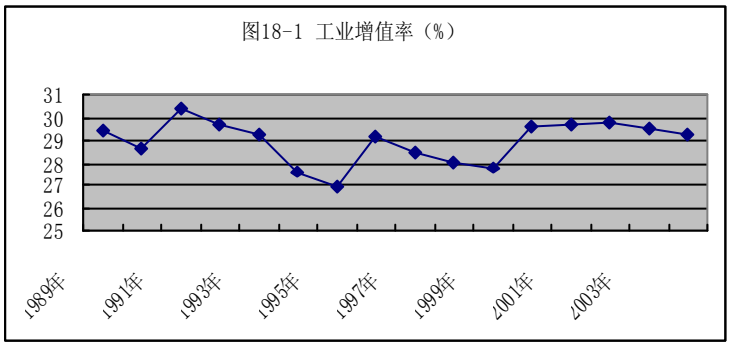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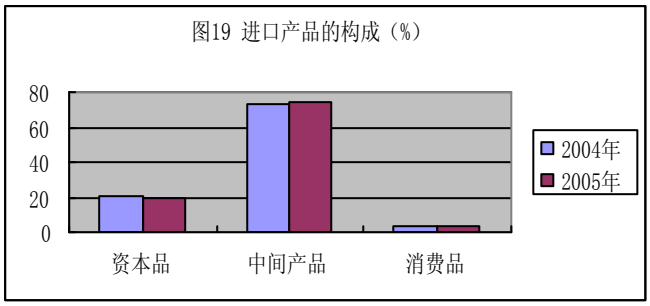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我国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2005 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专业化系数只有 0.049，轻纺产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贸易专业化系数为 0.23，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贸易专业化系数为 0.1，杂项产品的贸易专业化系数为 0.52。杂项产品直接体现了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在杂项产品以外，我国制成品中竞争优势最大的就是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由于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主要是资源密集型的一般加工品或者是资源和资本密集的矿冶产品及其制品，考虑到我国在初级产品上的贸易逆差和竞争劣势，这类产品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方式体现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即进口矿物原料等，经过简单的劳动加工后再出口。在高新技术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方面，贸易专业化系数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这反映出我国在相关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的改善和提高。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在高新技术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上具有显著的加工贸易特征，通过进口零部件和中间投入，经过简单的加工或组装后再出口。这当中体现的比较优势基础依然是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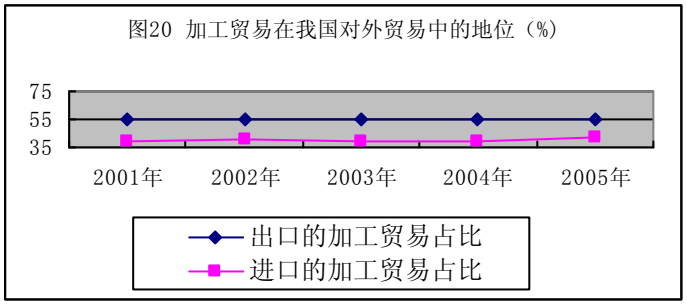
- **缺乏动态比较优势阻碍了我国工业生产附加值的提高**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工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动态调整的同时，由于比较优势的基础仍然建立在劳动成本优势之上，也就是说，比较优势并没有实现动态化，所以，国内工业生产的附加值并没有显著提高。进一步分析我国制造业增值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无论是重化工业对轻工业的替代，还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没有显著改变我国的工业增值率。2000 年以后，在我国重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制造业的总体增值率反而在下降（见图 18-1）。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增值率在 2000 年以后出现甚至明显的下降趋势（见图 18-2）。这也就说明，我国重化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没有摆脱投入驱动的模式，而投入方面又必须依赖于进口才能突破国内约束。在我国进口产品中，中间投入占据绝大比重。2004 年和 2005 年，中间产品占我国产品进口的比重分别是 72.9%和 74.7%（见图 19）。在国内增值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或组装环节的情况下，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推动作为投入的进口品的价格上升，另一方面推动作为产出的出口品的价格下降，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得我国工业增值率在工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提升的同时，出现下降的趋势。工业增值率的变化趋势从一个侧面说明劳动成本优势依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基础。





通过分析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可以进一步证实劳动成本优势依然是决定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比较优势基础。2000 年以来，我国产品出口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维持在 55%左右；在产品进口中，加工贸易占比在 38～42%之间。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演变过程始终是围绕着劳动成本优势展开的。这是不变的基础。变化的只是，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中国发挥和体现劳动成本优势的形式、产业载体和产品载体在不断变化。顺应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和国际产业调整过程中的新机遇，中国通过调整工业化模式和对外贸易模式，实现了对外贸易和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变化，由此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外贸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这样的观点是有偏差的。中国工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变化更多的是反映比较优势的实现手段和产业载体的变化。

2004 年以前，以服装、鞋帽、玩具和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杂项产品我国制成品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这从根本上反映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即劳动成本优势。但是对比 2000 年前后的情况，在 2000 年以前，杂项产品还是我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2000 年以后，机械和运输设备成为我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变化趋势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就已经出现，机械与运输

设备出口逐渐赶上杂项产品的出口。这反映了我国工业化模式的变化，也是我国利用劳动成本这一优势的具体形式或手段发生了变化。90 年代中期以前，以一种较为直接的或显性的模式利用劳动成本优势，即直接大规模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内工业化过程也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90 年代中期以后，实现劳动成本优势的形式发生变化。除了借助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我国的比较优势，还借助于机电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重化工业这些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所以，在我国工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动态调整的背后，比较优势并没有实现动态调整。

四、基于劳动成本优势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问题及调整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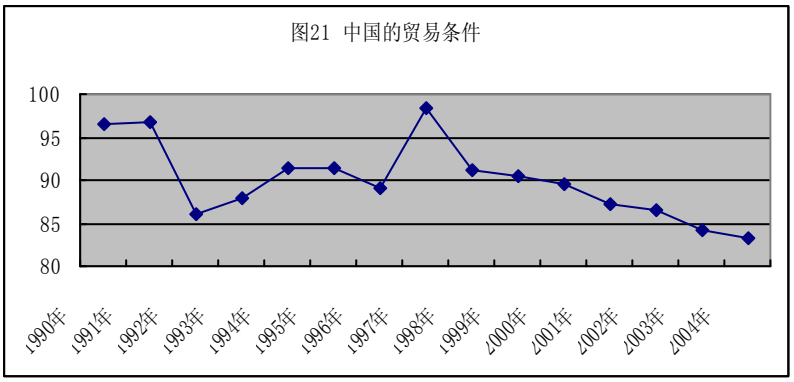
（一）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模式导致经济增长成本不断增加

近年来，贸易条件、资源消耗状况、产业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变化，已经显露出中国现有工业化模式和外贸战略的成本不断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在现有基于劳动成本优势的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战略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不断增加。

- **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明显**

近年来，在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化工业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同时，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外向性更加明显，重化工业在投入和市场两个方面更加依赖于国际市场。整体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基于制造业的 FDI 经济”，在这当中，加工贸易型的 FDI 又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模式之下，经济增长和产业扩张首先必然导致进口需求大幅增加，由此导致进口价格和成本上升；其次是出口供给急剧扩张，导致主要出口品的国际价格大幅下降。两者结合在一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我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收益下降，社会福利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步伐。

从图 21 中可以看出，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整体的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在我国工业化过程特别是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严重依赖于进口来满足投入需求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成本不断增加。这也是导致我国工业增值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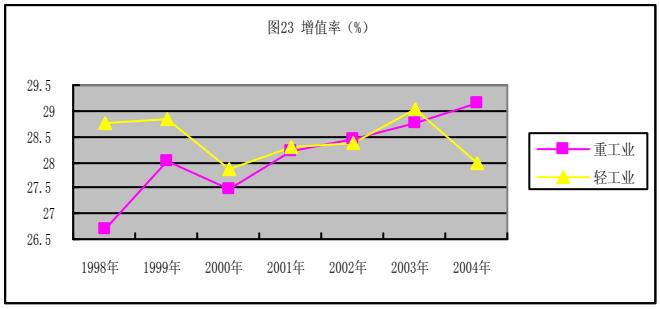


- **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

在总体上，我国是一个资源较为匮乏的国家，主要矿产资源、原材料、能源、水资源、土地等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样的资源条件下发展重化工业必然意味着进口需求的迅速增加，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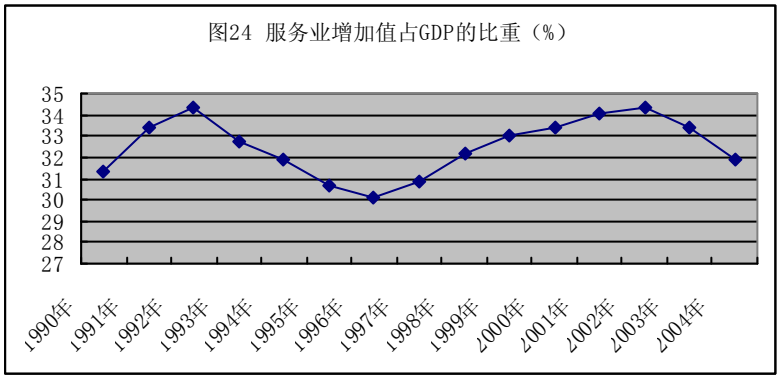
在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条件下，以大规模出口带动重化工业的发展，导致我国的重化工业陷入高消耗、高产出的恶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 增长 10 倍左右，但是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 40 倍左右。主要产品生产的能耗远远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01 年以后能源消耗的年增长率超过 GDP 增长率。2003 年我国实际 GDP 占世界的比重为 4%，但是原油消费占世界的 7.4%，原煤消费占世界的 31%，铁矿石消费占世界的 30%，钢材消费占世界的 25%，水泥消费占世界的 40%。每单位 GDP 产生的二氧化碳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300%左右，废水排放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400%。重化工业的发展，在带动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同时并没有带来更高的增加值。重化工业并没有表现出比轻工业更高的增值率（见图 23），因此对后者的替代也不能显著提高我国工业的增值率。

图 22 能源和电力消耗增长率



- **贸易品部门过度发展和服务业发展滞后，长期就业压力加大**

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模式导致贸易品行业的过度发展和整体产业结构的扭曲。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战略下，资源流向贸易品工业，社会生产结构向贸易品工业倾斜。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特定的外汇管理制度，导致整个社会的信贷分配格局向贸易品部门倾斜，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得不到足够的信贷和政策支持。其结果就是，非贸易品部门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在我国 GDP 中的比重不到 35%，远低于世界平均的 64%。2002 年以后，在我国重化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服务业的比重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服务业作为正外部性极强的产业，其发展不仅有利于就业创造，还对其他行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不利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和长期经济增长。



重化工业本身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或者资源密集型产业。投入和产出规模的扩张并不能带来显著的就业创造效应。加之我国重化工业发展战略基本是一种“两头在外的模式”，国内主要从事的是加工环节，增值规模远远低于总体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这也进一步阻碍了就业创造。与此不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贸易品部门，其发展不仅具有显著的就业创造效应，而且对于其他部门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无论是重化工业还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作为贸易品部门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和整体产业结构扭曲，不利于我国就业压力的缓解和整体的长期增长。

- **比较优势固化的风险**

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战略下，我国面临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贸易条件恶化意味着我国进口成本的加大，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具有明显的加工贸易特征，进口成本增加会损害出口竞争力和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企业削减包括研发投入在内的各项开支。此外，为了维持贸易品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倾向于使用出口退税、出口补贴、低工资、低利率等措施。这不仅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限制了国家在研发和基础科研方面的投入能力，而且会使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利润下降趋势使得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下降；财政补贴和退税使得财政收支恶化，抑制政府资助研发和科研的能力；低工资成本也会抑制企业使用现金设备和研发创新的意愿。这不利于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和升级，甚至会使我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导致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固化，阻碍了国内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二）政策建议

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模式下，我国经济增长成本不断增加。为此必须摆脱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转向强调工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对外贸易战略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配合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

- **摆脱“轻工业→重化工业”这一简单的工业升级模式**

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从轻工业逐步过渡到重化工业阶段，似乎都是工业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基本模式。但是从中国的客观条件和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模式既非必要、也不可行。在开放条件下，工业化模式的选择依赖于国内的比较优势基础，工业化模式变迁的实际效果也取决于比较优势基础。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就业压力较大、资源匮乏、自主创新能力较低、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供给能力不足，重化工业加工规模的扩张并不能带动产业链条在国内向两头延伸。在这种状况下，我国的工业升级就不应该选择“重化工业替代轻工业”这样的简单模式。在目前重化工业化趋势日渐明显的背景下，要打破“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发展重化工业→能源和原材料进一步短缺”这样

的恶性循环，必须从政策层面做出调整和引导，抑制各地盲目发展重化工业的趋势，切实、有效地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升级在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利用新技术和信息产品改造传统产业；逐步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在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基础上发展新的工业部门。

- **逐步改变外贸战略的出口导向性，从“重视出口”转向“重视进口”**

贸易战略调整的基本原则是服务于工业化战略调整的需求，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创造条件。在中国的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尚不发达的条件下，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改造还是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建立，都面临投入约束，必须通过进口来满足。所以，必须调整进口战略，鼓励和引导信息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相关机器设备的进口。这牵涉传统贸易政策领域中的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调整，还涉及汇率政策、国内立法和市场秩序等问题。通过贸易政策调整，降低进口过程中的政策成本或贸易成本；合理使用汇率政策，适度的升值有助于压低相关产品和技术的 进口成本，从而降低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完善国内法律体系、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信息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相关机器设备的进口营造一个稳定、低交易成本的大环境。这方面的调整更多的是关注于如何突破建立新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时面临的国内约束。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压缩和降低一般制造业的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意味着主导产业从传统产业转向新产业。在新、旧产业交替的过程中，国内会出现短暂的“主导产业缺位”的问题。这会增加国内就业压力、财政压力和其他社会压力。这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新产业的建立和传统产业的改造。贸易政策的调整应该兼顾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避免一般制造业或加工工业的急剧收缩。应该减少对一般制成品出口和加工贸易型 FDI 的优惠政策，让市场竞争压力引导投资者和企业的主动调整，避免出现政策激励与政策目标不相容的问题。出口方面的政策重点引导一般制成品的出口规模有序的降低，避免出现威胁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甚至是引发社会问题的急剧收缩。

- **加快调整外贸企业的工资形成机制，使工资水平和各种社会福利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状况**

这既可以激励劳动者进行必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可以避免贸易企业过度依赖低工资来获取竞争优势，增强贸易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减少直至取消对贸易企业的各种政策优惠和补贴，让贸易企业的竞争力回归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这一基础。在较少直接出口补贴的同时，增加对研发和基础科研的财政投入。通过这些调整，加快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我国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人才数量优势；提高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和技术转让和扩散体系的构建。最终实现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不断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定位始终依赖于劳动成本优势的格局。

- **通过贸易政策和引资政策的调整，充分发挥外资和外贸对国内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

在过去几年中，我国进口产品特别是资本品进口的来源和 FDI 来源越来越集中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进口产品和 FDI 的技术含量。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提升进口和 FDI 的技术含量。首先是完善国内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发展和完善金融体系，增强国内对较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和 FDI 的吸收能力。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和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金融体系，将有助于提高我国进口产品和 FDI 的技术含量。其次是加强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协调与合作，为提高进口产品和 FDI 的技术创造有利的国际市场和政策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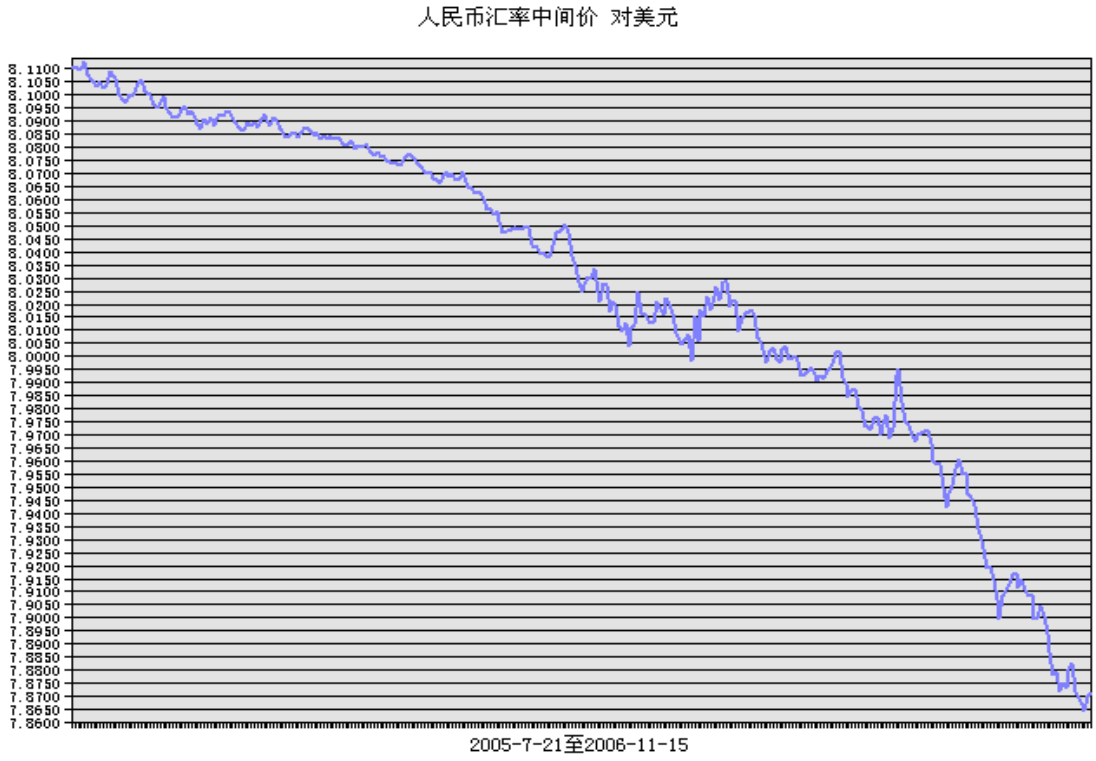
报告七：

人民币汇率——加快调整速度，深化制度改革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目前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人民币汇率是否会继续升值？短期内升值的幅度会有多大？中长期汇率会如何变动？汇率升值对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汇率制度应该如何改革？本节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历史与现状，探讨目前人民币汇率对经济的影响，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趋势做出预测，为汇率制度改革提出建议。

一、人民币升值缓慢

2005 年 7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一次性升值 2%，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2006 年 1 月 4 日，人民银行决定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由此改进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汇率弹性进一步加大。



图一：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对美元　　本图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汇率弹性的增加加速了汇率调整的速度。由于改革前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汇改后人民币逐渐升值。汇改初期，升值速度较慢，2006 年 4 月后速度逐渐加快。到 2006 年 11 月中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破 7.87，累计升值 5.01%。汇率波动见图一。

从名义汇率角度看来，人民币升值幅度颇为可观。近来开始有学者担心人民币升值过快可能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但事实上，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速度不是太快而是太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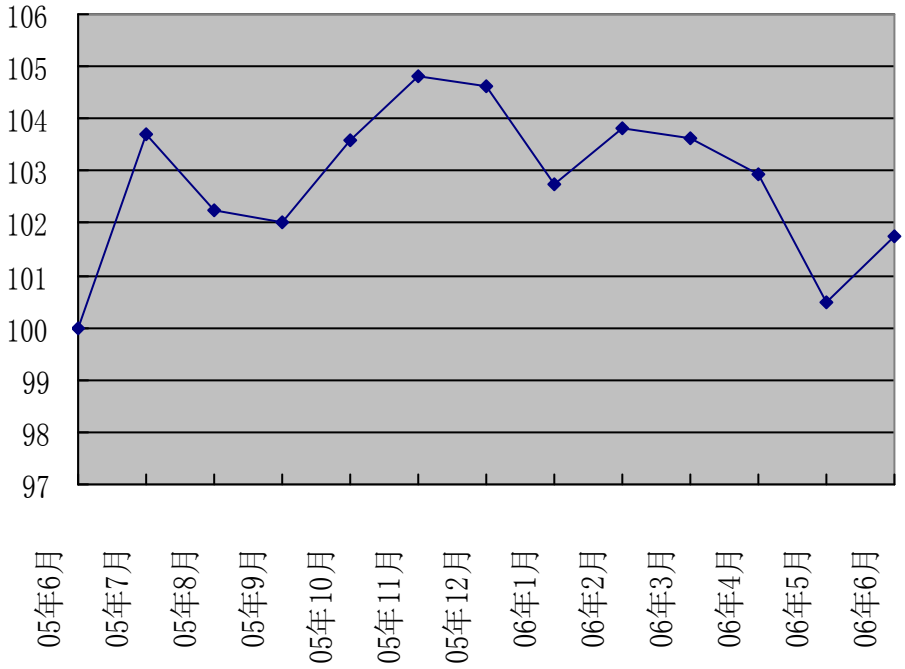
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速度偏慢。

在国际经济中，决定一国货币汇率是否处于均衡并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汇率。实际汇率是根据名义汇率把外国一篮子商品的外币价格换算为本币价格后与本国一篮子商品价格之比。如果实际汇率偏高（通常称为实际汇率低估），则意味着本国商品价格水平相对偏低而外国商品价格相对偏高，会导致本国商品大量出口而进口较少，出现贸易盈余；反之，则造成少量出口、大量进口，出现贸易逆差。

据测算，汇改前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低估了约 20~25%，汇改时实际汇率随名义汇率一起升值 2%。汇改以后，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了 3.01%，但从 2005 年 7 月到 2006 年 7 月，美国通胀率为 4.1%，中国通胀率为 1.2%，因此汇改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几乎没有变化，所谓人民币升值实际仅仅体现在汇改时的一次性升值上。

另一个实际汇率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与对某一种特定货币的实际汇率不同，实际有效汇率指剔除通货膨胀对各种货币价值影响之后，以对外贸易比重为权数计算的加权平均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同时考虑了本国货币对世界各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实际汇率数值上升代表实际汇率升值，下降代表实际汇率贬值。

图二为 2005 年 6 月至 2006 年 6 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过程，取 05 年 6 月为 100。



图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05 年 6 月为 100　　数据来源：IFS 数据库

从图中可以看出，2005 年 7 月人民币升值之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上升。但在此之后，特别是 2005 年 11 月之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再次进入下降通道。至2006 年 6 月，实际有效汇率值还低于 2005 年 7 月。相比升值前的 2005 年 6 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仅升值 1.75%左右。相对于 2005 年 7 月，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了 1%。

根据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和有效实际汇率来看，2005 年 7 月 21 日以后，人民币实际汇率仍然处于贬值通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二、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

人民币汇率调整之前，包括蒙代尔、麦金农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强烈反对人民币升值。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产业竞争力下降，进而引起经济增长减速甚至衰退。他们还以日本为例，提出日元大幅升值是 90 年代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意见，认为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劳动力成本的巨大优势，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部分学者还主张人民币应迅速升值，甚至有人主张应一次性升值 5~15%。

2005 年 7 月 21 日人民币升值以后，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对外贸易也未受到显著影响。2005 年全年，中国贸易顺差首次突破 1000 亿美元，2006 年 1-9 月，累计顺差

达 1,098.5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0.7%。汇改后进出口及贸易顺差情况见表一。同时，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2006 年第 1、2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10.9%。

表一　汇改后进出口及顺差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度月份	当月			当年累计		
	进口	出口	顺差	进口	出口	顺差
2005-7	549.1	655.3	106.3	3,575.9	4,078.2	502.3
2005-8	577.8	683.7	105.9	4,153.8	4,762.0	608.2
2005-9	626.2	701.5	75.3	4,780.0	5,463.5	683.5
2005-10	560.5	680.3	119.8	5,340.5	6,143.8	803.3
2005-11	616.7	722.0	105.3	5,957.2	6,865.9	908.6
2005-12	644.0	754.1	110.1	6,601.2	7620.0	1,018.8
2006-1	554.9	651.3	96.4	554.9	651.3	96.4
2006-2	515.7	541.1	25.4	1,070.6	1,192.4	121.8
2006-3	668.6	780.2	111.6	1,739.2	1,972.5	233.3
2006-4	664.4	769.0	104.6	2,403.7	2,741.6	337.9
2006-5	601.0	730.9	129.9	3,004.6	3,472.4	467.8
2006-6	668.3	813.0	144.7	3,673.0	4,285.4	612.5
2006-7	657.1	803.3	146.2	4,330.1	5,088.7	758.6
2006-8	719.7	907.7	188.0	5,049.8	5,996.3	946.6
2006-9	763.4	916.7	153.0	5,813.8	6,912.3	1,098.5
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						

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中国是否能承担更大幅度的升值？

传统观点认为，货币升值会造成成本上升，本国产品价格相对上升，因此本国和外国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对产出、出口和就业产生收缩影响。与此对应，传统观点认为，货币贬值对产出和就业有正面影响。

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汇率升值也可能产生扩张效应。在需求方面，汇率升值以后，一方面是进口的最终产品价格下降，另一方面，进口原材料价格也下降，从而引起本国产品价格也下降。由于产品价格下降，居民以货币形式持有的财富价值相对上升。财富效应会使人们增加消费。在供给方面，本国企业的资产价值(以外国货币衡量)上升，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能力提高，可以扩大生产能力。

在中国的客观环境下，货币升值主要还是产生收缩效应。一方面，在中国，居民边际储蓄率极高(40%左右)，因此财富效应对需求的作用很弱；而中国储蓄率极高也使得企业对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需求不高。因此，升值带来的扩张效应很弱。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来自东南亚、印度、拉美、非洲等国的竞争。

汇改以后，中国贸易顺差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包括实际汇率调整幅度较小、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美国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并不表示人民币升值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汇改以后，东南沿海部分民营企业、纺织品企业利润率已经受到影响。如果汇率在短期内调整幅度太大，会导致较为严重的经济后果。根据我们的分析测算，如果汇率一次性调整超过 5%，将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引起增长放缓甚至衰退。

虽然人民币升值会对经济产生收缩效应，但在目前经济存在过热危险、中央推行宏观调控的条件下，适当升值有助于让经济降温，实现软着陆。如果在经济增长减速时再推行人民币升值，会加重经济衰退。反过来，如果维持汇率稳定，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产生冲突，最后必定导致通货膨胀。在目前情况下，通货膨胀将加剧经济过热的危险，对经济长远发展造成伤害。可以说，现在正是实现汇率调整的有利时机。

三、汇率调整前景——稳步升值

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是，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向如何？人民币会不会持续升值？升值幅度会有多大？

这些问题需要分成近期(一年以左右)、中期(一年后，五年以内)和长期(五年以后)来回答。

根据各方面信息可以断定，近期内，人民币将会继续稳定缓慢升值。2006 年内对美元汇率基本会维持在 7.83 比 1 以内。2007 年以后，如果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不发生太大的变化，人民币仍将稳定升值，到 2007 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将升至 7.65~7.7 左右。

这些判断主要基于三方面理由。

一、近期内，汇率制度再次大规模修正的机会不大。人民银行不太可能再次重估人民币汇率，否则可能引起重估预期，引发投机。汇改后新机制正在逐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正逐步落实，央行不太可能再次对汇率动大手术。

二、人民币汇率仍然低估，市场力量将逐步推动升值。因此人民币会稳步上升。由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避险的能力都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仍然会以稳为主，逐步调整人民币汇率。

三、关于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判断，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市场信号：2005 年 11 月 26 日，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了一次 60 亿美元的掉期交易，约定汇率为 7.85 比 1。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到期日如果汇率偏离 7.85 太多会引起央行或商业银行巨额亏损，因此到期日汇率将在 7.85 比 1 左右。到年底，大致会维持在 7.8 比 1 左右。2006 年 10 月以来，国内交易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一年期远期汇率大致维持在 7.70 左右，在海外，美元兑人民币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大致维持在 7.65~7.7 左右。这些信息代表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如果不发生大的意外，一年后，人民币汇率将稳定提升至 7.65~7.7 左右。

在中期即一年至五年左右，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人民币升值速度将会加快。

根据加入 WTO 的有关承诺，到 2006 年底，中国对外资进入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限制将基本消除。虽然 WTO 协议并不直接涉及汇兑制度，中国并未承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未承诺货币完全可兑换，但随着资本市场开放，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会越来越困难。在跨境资本流动受管制的条件下，投机性资本流动较为困难，中国能够在维持汇率稳定的条件下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资本流动管制削弱以后，中国将面临三元悖论——不能同时实现汇率稳定、资本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投机性资本将迅速大量流入，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截至 2006 年 9 月底，已有 50 家海外机构获得 QFII 资格，额度突破 80 亿美元；12 家银行获 QDII 资格，额度达 111 亿美元，中国资本市场正在迅速开放。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人民币汇率低估将越来越难以维持。除非愿意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承受较高的通货膨胀，否则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人民币升值步伐必定会加快。

从长期(大约五年以后)来看，除非中国和世界经济发生大波动、大调整，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趋势不会改变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中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在未来二十年以内，经济增长率都可望保持在较高水平，人均收入提高较快。根据经济学中著名的巴拉萨——萨缪尔逊定理，经济高速增长通常会引起汇率升值。从世界经验来看，战后很多国家在经济起飞时名义汇率都有较大幅度上升，例如德国马克兑美元名义汇率从 1968 年的 4.0 比 1 升值到 1987 年的 1.80 比 1，20 年中升值 55%；同期日元兑美元从 360 比 1 升值到 144.6 比 1，升值了 60%。

中国经济起飞也会带动汇率升值。

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必要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规模较小，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意义不大，选择了把货币与美元挂钩。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就采用了类似做法。这样即使经济高速增长，汇率也不会波动，但会导致通货膨胀。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独立的货币对于调节经济有重大意义。长远来看，中国必定会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让汇率浮动。在控制通胀的目标下，经济增长会导致汇率升值。

总之，在短期内，人民币会稳步缓慢升值；在中期内，人民币升值步伐将会加快；在长期中，人民币仍然会保持升值的势头。

四、加快汇率制度改革与外汇市场建设

相比汇率的波动而言，汇率制度的变革与外汇市场建设的意义更为重大，更值得关注。本节分析目前汇率制度的优点与不足，并对外汇市场建设提出建议。

如前所述，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外汇交易市场上，人民银行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对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确定每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规定汇率在中间价上下 0.3%区间内浮动。这一制度既有其优点，也有明显的不足。

这一制度的优点是央行对人民币汇率保持强有力的控制，遏制了投机。由于人民币汇率是“参考”而非“绑定”一篮子货币，且央行并未公布一篮子货币的种类与权重，为央行干预汇率留下了空间。同样，由于即期外汇市场的询价制度并不公开确定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方法，央行可以通过确定中间价对汇率趋势施加影响。每日汇率波动区间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汇率大幅波动，有利于抑制投机。在目前中国外汇市场发展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府的强力干预对维护市场秩序，保持汇率稳定有积极作用。

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央行对汇率的干预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由于汇率形成机制不透明，市场不易形成准确的预期，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管理的困难加大。央行的干预固然增加了汇率的稳定性，但也可能扭曲市场，还可能引起动态不一致问题，造成效率和福利损失。

在过渡时期，央行进行适当的干预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随着金融市场的成熟，汇率制度也要逐步变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央行应逐步放宽汇率波动的幅度，同时使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公开化，透明化。当条件成熟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并最终实现人民币自由可兑换。

外汇市场建设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如果没有一个稳定有效的外汇交易市场，中国经济很难承受汇率波动带来的冲击，汇率改革将无法顺利推进。

目前，即期外汇交易市场已经基本建立，但远期外汇交易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还有待完善。

汇改启动以后，央行放开了远期外汇定价，远期外汇市场逐步启动。2005 年 8 月15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推出了远期外汇交易品种，并允许越来越多的机构入市交易。2006 年 6 月 19 日，建行上海分行开始推出个人远期外汇交易产品。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运作，远期外汇交易仍然不够活跃，成交量偏低。目前参与远期外汇交易的交易主体基本仍是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很少从事相关交易。虽然银行已经为企业提供代理远期外汇交易服务，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多数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没有利用远期外汇交易工具控制汇率风险。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由于过去汇率长期稳定，企业，金融机构甚至国有商业银行都严重缺乏风险意识，忽视暴露外汇头寸带来的风险。例如，中国建设银

行在2005年报中披露，在2005年下半年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了18.86亿元的巨额亏损，这显示建行有巨额未平仓外汇头寸，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之多。而规模比建行更大的汇丰银行，由于完善的风险管理，其未平仓外汇头寸不过数百万美元，即使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也能把损失控制在数万到数十万美元以内。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表现尚且如此，中小企业的风险意识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其次，远期外汇交易市场还存在交易主体较少，产品种类匮乏等问题。国内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由于缺乏资信，流动资金紧缺，很难通过远期外汇交易对冲汇率风险。

第三，汇率波动幅度较小也影响了企业通过远期外汇交易避险的意义。汇率风险是指汇率的不确定性。当汇率变化过于平稳时，远期汇率不确定性不高，风险管理意义不大。企业乃至金融机构缺乏参与交易的动机。

因此，为了加速外汇交易市场的建设，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强化风险意识；二是引入更多的交易主体，逐步开放外汇期货、期权乃至其他衍生产品的交易。随着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提高，企业对外汇交易产品的需求将会增加，市场会逐渐活跃起来。

五、总结

本文主要探讨了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的演变，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外来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了预测。最后，我们还分析了汇率制度的现状和未来改革的方向，以及外汇交易市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李扬、余维斌，2005：《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回归有管理的浮动》，《经济研究》第8期[J]。

刘元春、钱宗鑫，2005：《中国CGE模型与人民币升值》，《开放经济评论》第1期[J]。

Goldstein, Morris, and Nicholas Lardy, 2003, “Two-Stage Currency Reform For China,”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2, 2003[J].